

高教信息参考

2018年第06期(总第125期)

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 主办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主编

2018年10月30日

目 录

特别关注	行业办学成为新风潮?	(1)
	数字时代, 高校图书馆还需要纸质书吗?	(3)
	提质增效 中外合作办学绽放华彩	(6)
部委要闻	孙春兰辽宁调研: 发挥教育优势 服务东北振兴	(10)
	教育部召开直属系统警示教育大会 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会召开	(11)
	多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12)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 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12)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加强校园食品安全防控工作	(14)
高教纵览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2018年第6号预警: “培训贷”里有陷阱, 广大学子别盲信 ..	(14)
	陕西省扩大高级职称自主评审范围	(16)
	“一带一路”能源电力高校及产学研联盟成立	(16)
	湖南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名单出炉	(17)
	浙江政策引导毕业生涉农创业	(17)
	广东省教育厅公示新一批“上岗退费”人员名单	(18)
	北京市设立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	(18)
	重庆市高校出台举措强化本科教学	(19)
多所高校对学生学业念起“紧箍咒”	(19)	
校长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 应对教育变革重大挑战 创新教育研究资助体系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	(21)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 为未来而学习: 面向21世纪的通识教育	(24)
理论探索	审核评估视域中高等教育秩序的重构	(27)
	“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	(33)
他山之石	大学共同治理的新局面: 基于组织文化和制度领导的视角——以北欧五所大学为例(上)	(38)
	大学共同治理的新局面: 基于组织文化和制度领导的视角——以北欧五所大学为例(下)	(41)
高教人物 数说高教	许敖敖	封里
	2006年——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数(历史学)	封底

高教人物



许敖敖(1940.02--), 男, 江苏常州人, 著名天文学家、高等教育家, 现任澳门科技大学校监顾问。

1962年, 许敖敖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 留校任教。曾任南京大学天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 1990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天文学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曾任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2003—2012年任澳门科技大学校长。

许敖敖多年来一直从事太阳物理学、空间物理学及等离子体物理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太阳活动现象, 如太阳耀斑、太阳黑子、日珥等活动客体的研究方面有诸多建树。学术成就包括: 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100篇, 在太阳活动区物理方面的科研成果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等奖。

许敖敖主持南京大学教学和招生工作近十年, 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他在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南大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开展了教育思想大讨论; 最早把文化素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 最先全面实施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 基础学科人才基地的建设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从而使南大本科生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 南大的学生不仅受用人单位欢迎, 而且在国际、国内多项大学生竞赛中频频摘取桂冠。提高了南京大学的国际知名度, 为南京大学整体实力在全国高校中稳居前三名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南京大学教学管理和改革的领头人, 许校长2001年荣获第四届国家教育成果一等奖。

您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您的意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的方向, **欢迎反馈意见和建议。**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联系方式:

QQ在线: 980567269、498125855

联系电话: 0736-7186097-829

电子邮箱: hnwltsg@163.com

馆内咨询: 西院图书馆四楼工具书阅览室

行业办学成为新风潮？

任何大学都不是万能大学，如果想做“万能大学”，实际上就是“不能大学”。一所大学要汇聚大部分力量，至多着力于两三个行业，集中兵力发展优势，要有干大项目、解决大问题、非得把某一行业搞上去不可的志向和决心。

伴随着前一阵的开学季，一些名字怪异的野鸡大学被纷纷揪出。然而，在众多名字怪异的大学中，有3所高校却是正儿八经由行业或企业筹建的“中”字头，它们分别是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中国核工业大学。

关于这3所高校的筹建，社会上有着不少争议。然而，就在人们的吵吵嚷嚷声未绝时，中国康复大学的成立已经板上钉钉。一所新建的“中”字头大学将落户青岛，争相见诸报端。

仔细回想，大规模成立行业院校已是建国之初的事了。自1998年，我国将行业院校办学与中央部委脱钩，新建行业院校也已经很久未见。那么，此次论证或筹建3所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又意味着什么？

办学与时代紧密联系

行业院校的兴衰，历经往复，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205所院校，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走综合性大学路线。当时，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并没有直接联系，人才培养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开展行业办学，把综合性大学变为单科性大学，服务于特定行业，从而建立起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也从社会边缘走向了社会中心。

行业院校在我国存在了很长的时间，直到1998年，我国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多部委。同时，将近400所高校中，除了少数保留在行业，依旧为行业院校；少数划转为教育部直属，成为高水平行

业特色高校；绝大部分划转地方管理，成为地方行业划转院校。其中，地方行业划转院校，最多的当数北京、辽宁、陕西、湖北、江苏等地。

采访中，东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以冶金行业院校为例，包括教育部高校在内，尤其是划转地方的钢铁院校，没有坚持特色发展，贪大求全、求高，导致“传统、特色的领域关系逐渐疏远，原有强项继承不多，新的东西还没长起来”。高校与部委脱钩为日后高校建设的“千校一面”埋下了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反思——把行业院校划转至地方，以及对行业院校的历史评价是否正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指出，之所以要把行业院校划转地方，当时一个重要考虑在于专业上的重复建设——地方院校办此专业，行业院校也办此专业，“大而全，小而全”，而且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适应性不强，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由行业经济走向区域经济的进程中，把行业院校变为地方院校，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逻辑。

如今，人们的反思是有历史对照的。1998年的那场改革，有少数院校没有划转，依然留在行业，如原卫生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发展势头远超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下属的7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最差的也位列“211工程”。“没有划转的兴旺发达，划转到地方的境况惨淡。”周光礼说，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反思发现，行业办学并非都是弊端，依托行业容易办出特色。

追逐“中”字头的背后

值得琢磨的是，此番筹建的3所院校，申报的校名均为“中”字头。

包括周光礼在内，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中字头

行业院校的成立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创立的鼓舞。二者均依托研究机构，原先只有研究生教育，如今开办本科生教育。

“这3所大学和中科院大学、社科院大学的性质相仿，只是个别依托的行业、企业级别略低，你可以办，我也可以办，本质上都是一种效仿行为。”周光礼说，对于“中”字头的向往，也是承自上一轮改革的经验与教训。部属院校的资源配置是国家级，下放地方后资源配置为地方级，办学资源萎缩导致其发展状况不佳。

只是今时不同往日，相比较上一轮改革，地方政府把高校看作包袱，认为其在用地、人力、拨款上颇占当地资源。如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使现在的地方政府普遍意识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由高校来提供区域创新动能，因此，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城市正在大力引入高校。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深圳、青岛，被媒体称为“高校的挖掘机”。青岛引进高校中，共有23所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其中，14所入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9所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

在3所筹建院校中，中国康复大学、中国能源大学选址拟定或初步确定为青岛。此前中国社科院大学也传闻会落户青岛。

“引入一般的大学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快速发展需求，它迫切需要人才、学术均为国家级资源配置的‘中’字头高校。这也是地方政府热烈欢迎‘中’字头行业院校落户的主要原因。”周光礼说。

行业办学成为新趋势

上世纪90年代，学界流行着一句话：“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因此，很多高校在定位之初普遍认为，要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成为综合性大学。那么，3所高校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综合性大学的趋势发生逆转？

在周光礼和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看来，如今兴办行业院校并不意味着综合性大学之路发生逆转，

而是代表了一种新趋势。

“行业办学的弊端当年已经被反复讨论，未来发展不太可能重蹈覆辙。”陈洪捷表示，3所院校的出现，更重要的在于为高等教育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大学办学并不能培养行业所需人才，所以行业才决定另起炉灶。

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高校建设学习苏联，普遍走偏专业型的欧洲大陆体系，但逐渐发现，这一体系下的高校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中不敌美国高校。改革开放后，转向偏综合性办学的盎格鲁北美教育体系，又陷入了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办学的旋涡。

周光礼表示，在2017年的“双一流”高校建设中，政府将一大批特色鲜明、优势学科单一的高校纳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对于片面模仿综合性大学的高校而言，敲了当头一棒。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特色、专业、行业性，又开始成为高校的新选择。

那么，这一选择究竟代表了中国特色，还是全球趋势？

在周光礼看来，该选择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特色。他解释，高校是资源依赖型组织，在一些国家、政府是高校办学的最大推动力。区别于美国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高等教育处于“市场体制”下，高校要满足多样化需求，因此必然建立综合性大学；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每个行业都有大型国企、骨干企业，在满足需求方面，首先要为央企服务，这也是新时代强调行业特色的重要原因。

盲目兴建成为最大担忧

“未来是否会刮起行业兴办大学的风潮，使得办学成为比关系、没规则的行为？”这是在本次采访中，3位专家最大的担忧。

成立大学固然要满足教育部的基本要求，但有无必要由一个行业或联合几个行业成立一所大学，就值得言说了。

陈洪捷表示，新办行业院校如果只是作为个别现象出现尚可，但作为未来的方向并不可取，因为

任何行业都有特殊需求，特殊需求可以通过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加强。只要有钱就可以办大学的逻辑，容易形成一定的垄断，“你培养的人才你用”，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王国栋指出，1956年那一轮行业院校的兴建，主要目的是支持我国建国初期基础工业的发展，针对原来发展薄弱的行业，建设一批行业特色鲜明的高等学校。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还会兴办一批行业院校，但它不是无限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中面向未来、基础相对薄弱、需要快速突破的战略性领域。这些学校可以归教育部管理，办得好可以进入“双一流”。

他举例，中国海洋大学是“双一流”“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面向的是重要的海洋领域，因此当年有成立的必要。能源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针对氢能源、可再生能源等，能源行业发展所需要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任务十分紧迫，设立能源大学正当时；康复在传统医学院中也有所涉及，但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会遇到许多过去很少面对的新问题，有必要通过专门的建设加以研究。而一些领域在现有高校中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和安排，如汽车、高铁，没有必要另外开办大学。

“必须面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关键不在于转型升级，而是面向未来，开辟新天地，满足新需求。”王国栋如是说。

除此之外，在陈洪捷看来，理想的状态应是行业与高校合作，在现有基础上打造适合本行业的发展道路，而不必另起炉灶。

他以德国为例解释说，德国鼓励企业、地区与高校深度合作，一方面高校得以发展，另一方面行业也获得收益，这也是国际上公认的校企合作途径。然而，我国高校条块分割的界限太死，使得一些跨地区、跨部门的合作难以开展。“应创造更多条件，鼓励高校与行业加强联系，无论从效率、资金投入上来看，都比新办院校要划算得多。”陈洪

捷说。

王国栋对此也表示同意。“任何大学都不是万能大学，如果想做‘万能大学’，实际上就是‘不能大学’。一所大学要汇聚大部分力量，至多着力于两三个行业，集中兵力发展优势，要有干大项目、解决大问题、非得把某一行业搞上去不可的志向和决心。”

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8年09月25日

数字时代，高校图书馆还需要纸质书吗？

“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究竟是数字的还是纸质的？”不久前，在昆明召开的“2018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已经举办过8届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被认为是“高校图书馆领域的顶级高峰论坛”。今年，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管理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承办的此次论坛，仍然吸引了全国各高校图书馆以及与图书馆相关的重点和标杆企业近千人参加。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背景下，此次论坛的焦点是：大学图书馆助力“双一流”建设的策略及实践。

对此，程焕文毫不客气地说：“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

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那么，在面对一边是网络化数字化盛行的时代，一边是中国出版行业每年出版50多万种的庞大出版量，高校图书馆该如何发挥文献保存的基本职能？该如何开展馆藏建设呢？

“这是一个难题。”程焕文说。

他指出，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正在进行“无形的蜕变”。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纸

质资源拥有者”蜕变为“数字资源使用者”。

“许多图书馆在购买数字资源的数量和预算上，都超越了纸质资源。”他说。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袁青，在论坛上展示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看法。

据袁青对2016年图书经费前20所的“双一流”高校的馆藏结构的对比分析：有15所高校数字资源的购买经费超过了纸质资源。只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纸质文献经费比电子文献多。

尽管袁青认为，理工科学校需要掌握国际学术前沿信息，师生教学更依赖期刊全文数据库，但在“纸本下降，电子上升，两者该如何共存”的问题上，她也感到疑惑。

对此，程焕文也深表担忧。他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数字资源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显示，图书馆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数字资源捆绑。

“这些数字化资源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在程焕文看来，由于数据商或数字出版商才是数字资源的拥有者，使得“图书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数据商的用户或用户代表”。

这种“数字拥戴”在近年来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诸多困扰，其中最大困扰是国内外数据商的数字信息资源垄断，造成数据库不断涨价，致使国内高校不得不联合抵制。2016年4月7日，本报就曾对“北大因中国知网涨价暂停续订，此前多所高校已停用知网”，发表过报道《多地高校图书馆预算难追数据库涨幅》。

同时，数据商的大宗销售策略还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同类数据库的内容重复度高达70%。图书馆为了获得30%的差异内容，不得不为70%的重复资源付费。由此也造成各高校图书馆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高校图书馆正在渐渐失去资源特色和学术魅力。

“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多年来，程焕文一直在呼吁“敬惜字纸”，并常常对人说，“纸张是个老不死的东西”。

在他看来，“没有纸本，图书馆就没有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国外访问，程焕文看到，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增长的同时，购买纸质图书的量并没有减少。2017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总量达到685万册，然而，这个位居全国高校前列的数据，在欧美大学图书馆的排名中却大约是在100位左右。而且，不少国外一流大学的馆藏非常有特色，甚至配合学校的学科建设，某些方面的特色做到了极致。

事实上，国内有不少学人也认为，“图书馆特色馆藏是高校学术竞争力的‘能源’。”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草拟过一份图书采购计划书，把经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间文献作为采购重点。顾颉刚先生曾怀揣着学校给他的10万两银票，到江浙等地购买了大量民间稗官野史，甚至还买了4万册碑文，使得中大图书馆拥有了一批珍贵的专业藏书。

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筹资1亿多元，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回购了931种28143册“大仓藏书”，其中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546册，朝鲜古籍1部2册。中国古籍中有极为罕见的《四库全书》进呈本22种，其中有4部孤本。

2005年，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建立的“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为国内唯一专事收藏西南联大文献的图书室。这里藏有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典籍：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

多年来，复旦大学一直在购买哈佛大学的原版英文教科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每年都用较多的经费进行图书馆特藏资源建设。在他们看来，“学术资源的积累有

多深厚多又特色，学科建设的平台就有多高大。”

“数字资源是数据商‘上门来求’，纸质资源则应是馆长‘出门去求’”。程焕文说，图书馆特色建设，不能只按书目采购，不去四处访求，他十分推崇上海图书馆几十年矢志不渝地收集各地家谱、方志和手稿，以至于此类藏书独步天下、无处可匹敌。

在担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10余年间，程焕文多次去安徽等地收集徽州文书。因“担心中途拦截”，每次都是“连夜去，连夜回”。他笑称，全国其他地方收藏的徽州文书仅40万件，而他为中大图书馆收集了21万件徽州文书，且都是一户户完整的文书，“徽州文书研究所都不及中大多”。

2004年，程焕文听到哈佛大学海勒斯图书馆精简藏书的消息后，把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请到了中大考察，最终说服了馆长，使中大获得了海勒斯图书馆赠送的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16万种人文社科类藏书，其中大多数是国内没有的珍品。

“数字时代，图书馆更应该恪守‘敬重纸本、珍惜纸本、保存纸本’的职业传统。”程焕文说。

如何遏制高校图书馆的纸本借阅率不断下降

本次论坛上，与会者在讨论中也掺杂着诸多无奈和担忧。因为，高校图书馆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纸本借阅率不断下降。

某著名高校图书馆曾对各学院不借书的学生量做了一个排行版，他们发现两个问题：“越高分的学生越不读书”；“数据库的点击量都是毕业生点出来的”。让他们不解的是，有许多学生从进校到毕业都没到图书馆借过书，也不用数据库，直到大四或研究生毕业要做毕业论文，才知道“原来学校图书馆有学术数据库”。

然而，高校存在的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图书馆的反思：

一直过着数字生活的大学生们，当无法借到教师指定的参考书时，即使图书馆有随手可得数字图书，他们也不愿意使用，而是呼吁增加纸本图书

的复本数量。

这让图书馆人感到：“纸本图书是有生命力的，纸本图书仍然是大学生系统学习的最佳选择。”

“在数字化盛行的今天，纸本图书不仅没有消亡，出版量还在增加，销售在回暖。这样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尊重和深思吗？”程焕文说。

为了止住高校阅读率下跌的趋势，许多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变得更加精细化，甚至嵌入到学院的学术团队和学术研究中去，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服务。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景康教授介绍，为学院系、机关部处提供的学科分析报告和数据，是清华图书馆转型升级的一项新服务。

如为汽车工程系制作“智能网联汽车全球专利观察报告”，长达近50页，从智能汽车专利的趋势、全球主要研发的企业专利中心，以及全球智能汽车专利技术态势等方面，进行了智能汽车产业界的全面分析。

清华大学附属医院曾有医生因无法使用校内的学术资源，在微信上叹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清华的附属医院，却不在清华的IP端里。”

图书馆获悉后，很快开展了8场讲座和培训，向医护人员介绍如何使用图书馆资源。这样的讲座和培训，也同时在其他院系开展。

2017年11月13日，清华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图书馆一个独辟的空间里，开始了经典绘画临摹课程的学习。从这一天开始，学校图书馆珍藏的仿真古画向师生全部开放。过去，由于仿真古画无法借阅，学生无法近距离临摹，美院的这一课程多年来无法有效开展。

“经典图书和资料不是用来藏的，而是要供教学和研究使用的。”邓景康说。

再高贵的头颅，在大学图书馆都要低下

程焕文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图书馆的空间如何才能更适合读者的需求？”

他指出，虽然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建了

新馆，但按照教育部的办学条件，仍然有不少学校图书馆的生均建筑面积不足。

“不去建设图书馆的纸质资源，就不会去建设图书馆的空间资源。”程焕文说，图书馆的空间资源与知识资源是同等重要的，展览空间、学习空间、共享空间和丰富的馆藏一样，是提高图书馆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也有图书馆人抱怨：“有的学生来图书馆，不看图书馆的书只看自己的书。”但在程焕文看来，“利用图书馆空间就是利用图书馆资源”，因为“大学图书馆就是学校的文化中心”。

他曾去牛津大学考察，对方安排参观的三个项目中，第一个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了解大学的根本。”他说，如果图书馆不能成为大学的文化中心，就建不成一流大学。显示一流大学水平的，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

作为一个学习空间，许多学人对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馆内持续举办的讲座和培训，让不少教师心潮澎湃。哲学系副教授宋继杰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写道：“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大学应该是80年代阶梯教室灯火通明人头涌动开讲座的模样。过去的一周，让我有时光倒流30年的感觉。”

“图书馆建设，就是要让所有人进入图书馆之后，肃然起敬。”程焕文说，“再高贵的头颅，在大学图书馆都要低下，向知识致敬、向文化致敬、向大学致敬”。

作者：张文凌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6日

提质增效 中外合作办学绽放华彩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方军的注意，即中外合作办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连续几年来远远高于重点线。

一所中英合办高校一年学费近10万元人民币，

但其高考招生分数线已经超过了重点线。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一名家长，本可以更轻松地一年花5000元学费让孩子上大学，但家长并没有，而是选择让孩子去读费用更为昂贵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

“这是为什么呢？”在近日于山东烟台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方军向700多名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外合作办学代表抛出了疑问。

“简单地讲，就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外合作办学水平高，质量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而通俗地讲，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和水平具备性价比。”紧接着，方军给出答案。

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外合作办学须贡献中国智慧

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大学，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

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正在向世界和中国展示其独特魅力。如方军所言，如今，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受到国际和国内社会的青睐，甚至有一部分国际和国内学生放弃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入学机会，选择来到上海纽约大学。

近5年来，国内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0%的境外合作院校属于“QS”排名全球前200以内的高校。方军在年会上强调，中方合作院校通过引进、融合境外高校先进的办学理念、优秀师资和优质课程，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大大提高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9月，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总数为2365个，其中本科及以上机构、项目1112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在校生约60万人，其中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为50万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已超过160万人。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为此，中外合作办学这种“不出国的留学”，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意味着新机遇，更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温州肯恩大学在提高高校党建质量新途径的探索，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在师资建设新机制的探索等，是中外合作办学不断涌现的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林金辉表示，这些说明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确立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可以表述为强化中外合作办学对教育教学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促进作用。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正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如何培养我们的年青一代为参与未来的世界做准备？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认为，这涉及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并且是全球高等教育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俞立中分析表示，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外合作办学大学肩负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培养一大批优秀且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大学又承担着培养新生代国际青年才俊的重任，这些新生代国际青年才俊愿意建立世界与中国的纽带，愿意了解真正的中国。

“中国教育要走向世界教育中心，中外合作办学应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林金辉表示，中外合作办学几十年来有两个方面的成功经验：第一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独特的制度设计，值得很多国家来学习；第二个是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中积累的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成功经验。

欣喜的是，目前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等国际组织已经关注到中国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和经验。过去几年，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经常收到来自国际组织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希望能够与中心加强合作。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还可以为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规则制定中增加话语权，贡献中国方案。例如，中外合作办学中好的模式和经验，不仅可以在中国高校内部互学互鉴，还可以反哺到外国的合作高校去。

牵住提质增效的“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2.0版”

201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依法批准终止的234个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动刀子”“一刀切”“叫停”“大规模审查”“中国出手了”……一时之间，国际和国内舆论出现各种版本的关键词解读。

“我们顶着很大的压力去终止这些机构和项目。”方军告诉记者，提质增效是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关键，特别是，质量的保障和提升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

近年来，教育部一直着力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教育部提高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门槛，并实施提升质量、监管评估、强化退出机制等一系列措施，而今年批准终止234个相关机构和项目正是支持完善和创新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体制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届年会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支持，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共同主办，并由鲁东大学承办。方军以年会为平台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初心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和促进国内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为此，中外合作办学必须聚焦建立高水平、高质量的机构和项目，满足部分学生和家長对优质国际化教育的需求。同时，扩大办学效率，让办学母体，让其他大学的教育改革开放得益于高质量的合作办学平台。

林金辉解释称，新一轮扩大教育开放背景下，

中外合作办学要处理好规模、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适度规模是基础，只有以一定的速度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形成规模效应；而达到一定规模后，创新质量就成为关键；最后，效益是目标，因为其直接决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地位和作用。

“让一个机构或者项目退出确实不容易。”林金辉坦言，但更关键的是准入机制的建设，未来要加快探索建立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国家标准体系，逐步实现政府以标准来管理，学校以标准来办学，社会以标准来监督。

“改革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度，这是确保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的‘牛鼻子’。未来，我们将继续牵住‘牛鼻子’，打造中外合作办学评估的‘2.0版’。”方军表示，教育部未来将加强和完善合作办学的监管工作，以确保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质量，实现优胜劣汰。

目前，教育部学位中心注重中外合作办学多样化评估，并提出一个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评价，采用“证据链”的方法，即通过证据集合证明被评估者的自我评价。教育部学位中心副主任林梦泉表示，在评估和具体评价机制上体现转型升级并实现“2.0版”，未来评估会采取多种转变，如从聚焦规范管理到更关注办学质量转变，从单一评估到定期和周期性抽评结合的办法转变，从两类体系到多元分类体系转变。本科、硕士、博士以及不同学科门类在体系上要有所区别，从限制评价材料到多信息源验证，强化评估的可靠性。

其实，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年上半年，英国召开跨境教育国际会议，就邀请了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黄宝印去介绍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

“通过评估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提升质量，同时，也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提供了支持。”林梦泉表示，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会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争取主导权，并制定具备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的中国评估标准。

“不要用西方的标准来框我们”，未来应区域化、差别化发展

今天的中外合作办学，有这么一组数据，催人深思。

截至2018年3月，全国39所“985”工程高校中，除了办学体制相对特殊的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其他36所全部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全国112所“211”工程高校中，目前只有11所没有正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首批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18所也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

“国内重点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已经不是‘稀客’了，更不再是什么‘生客’。”南京邮电大学郭强表示，致力于跨境高等教育的境外一流大学大多已经来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了，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来源的渠道已趋于平衡。

调查发现，一些境外的知名大学这两年对选择中国的合作高校变得越来越挑剔。郭强分析称，很多欧美名校正在推进国际化进程，除了在中国开展合作办学，也在东南亚开展合作办学。为此，我们未来拓展中外合作办学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去应对。

“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应该结合各自地方的优势，实现区域化、差别化的发展。”郭强建议并举例说，北大、清华以及“985”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资源最好，但研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最好的不一定是拥有最强资源的高校办的。

对此，鲁东大学副校长亢世勇感同身受。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是鲁东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二级机构，从建立之初，就依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战略定位，并立足于半岛蓝图经济区海洋装备企业特别是韩资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该校还围绕完善科研创新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主动服务和服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与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统一结合起来。亢世勇表示，新时代地方高校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需要整合发展优势，因地制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排头兵”。

对接国外合作办学资源，毕竟不是市场买卖。“不要用西方的标准来框我们。”面对记者的采访，林金辉发出这么一个倡议，在与国外合作办学资源对接制定标准时，中方院校必须坚持自己的标准。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出现一个倾向——过分强调“洋认证”，认为国外的就是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一味强调自己的中外合作办学外方合作高校世界排名多少，并将国外的排名作为唯一依据。

“其实，很多国外大学排名是基金会或者公司排的，其依据的标准不一定符合实际。中外合作办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学，‘洋认证’‘洋排名’只能作为我们办学的参考。”林金辉强调。

作者：黄金鲁克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9日

孙春兰辽宁调研：发挥教育优势 服务东北振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辽宁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以教育现代化夯实东北振兴发展的根基。

在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的重点实验室和研发机构，孙春兰详细了解科研成果应用情况。她指出，推进装备制造业优化升级，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高校要依托优势领域和领军人才，在部分“卡脖子”问题上集中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用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围绕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动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以高质量的成果助力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在中国（辽宁）自贸实验区大连片区 Intel 工厂、鞍山技师学院、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孙春兰着重了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情况。她强调，东北振兴离不开高水平人才的支撑。要加强交叉、前沿学科设置，加快推动课程、教法、师资、实践等改革，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鼓励各类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造就一支“大国工匠”队伍。要对接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加强订单式、有计划职业培训，培养更多的体育、旅游、医疗、养老等方面专业人才。

在辽宁期间，孙春兰还考察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鞍山市钢都小学，了解素质教育、体教融合情况，并在沈阳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教育服务东北振兴工作。她指出，教育事关科技

这个“第一生产力”和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在东北振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在学科专业设置、科研基地布局、重点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着力解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师范校建设等重点难点问题，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

教育部召开直属系统警示教育大会 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月 29 日，教育部召开直属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及中央和国家机关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通报教育部直属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贯彻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任务，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高度，整体把握、深刻认识警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政治责任抓在手中、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切实把教育部直属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陈宝生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部党组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态度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明显，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广大干部履职尽责，育人环境持续向好，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为书写教育“奋进之笔”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风清气正的教育政治生态正在形成，人民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陈宝生强调，开展好警示教育活动，是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有力抓手。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前车之覆，

前车之鉴。”要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镜鉴，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深刻反思、警钟长鸣。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健全制度、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切实推进直属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二是加强政治建设，着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政治根基。党员干部违反党纪党规，都是“四个意识”不强，“四个自信”不坚定，理想缺失、信念动摇、精神滑坡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所在单位党组织政治责任缺失、政治建设不实。要强化政治引领，不忘初心使命；严明政治纪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高政治免疫力；建设先进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切实按照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的政治要求，着力发现和认真解决管党治党中各种深层次问题。三是强化政治责任，确保直属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真正把责任担当起来，知责、明责、履责、尽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进一步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特别是针对核心机关、机要岗位、关键岗位人员，着力解决“灯下黑”、疏于监管等问题，进一步织密制度的笼子。

会议由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主持。他强调，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部党组直面问题的决心、敢于较真碰硬的担当，对进一步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要深入排查，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要力求实效，真正入脑入心见行

动。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吴道槐会上通报了教育部直属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在京教育部党组成员，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纪委书记，直属高校党委书记共400余人参加会议。

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会召开

10月24日，教育部党组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会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推进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把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工作重点尽快转到狠抓落实上来，在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上下功夫，按照大会总体部署逐条逐项落实任务，努力解决好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教育问题，确保贯彻落实工作取得实效。

会上，教育部各机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汇报了关于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阶段性学习体会、贯彻情况和下一步落实举措，部党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作了讲话。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宝生充分肯定了一个多月以来，各司局和直属单位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工作取得的进展成效，认为各单位结合实际各有领悟，工作进展各有所得，工作部署各有高招，实现了预期目标。他强调，目前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已进入新阶段，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加强谋划、狠抓落实，大抓100天、奋进2019年，努力实现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作为。

陈宝生对下一阶段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在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解决问题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把落实大会精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途径和重

要实践。要用“四个意识”导航，时刻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是不是在大局下开展、是不是有利于维护核心地位、是不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用“四个自信”强基，将之作为各方面工作开展的逻辑起点、历史起点、理论起点。要用“两个维护”铸魂，这是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保障。二是做好顶层设计，抓紧制定政策举措，务求见到实效。要针对政策的不同进展情况，“准备上场”的抓紧研究，“已经开球”的尽快审议，“踢过半场”的加紧推进，“临门一脚”的推动实施，“赛后评估”的注重强化纠偏。要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高政策措施和落实工作的质量水平。三是准确判断形势，认清问题本质，保持战略定力，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保持对形势的警醒，既充分认识成绩，也看到面临的挑战。保持对压力的警醒，将压力转化为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动力。保持对能力水平的警醒，按照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对我们责任担当、工作能力等方面提出的要求，不断增强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

陈宝生强调，实践证明，实施“奋进之笔”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要不断制度化、系统化。2019年教育“奋进之笔”要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为核心，聚焦加强部机关与地方教育部门联系、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能动性等尽早谋划设计实施的项目、载体，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新成效。

多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院院士大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决定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了涉及“四唯”做法的具体清理范围，科技部要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人才项目、基地建设、机构评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以及所属事业单位职称评审、人员绩效考核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教育部则重点清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基地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并指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需重点清理人才项目、职称评审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中科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院所评估、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指导和督促所属科研院所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中国工程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自然科学基金委则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中国科协需重点清理院士推荐、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等。

《通知》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对各部门、各单位清理情况进行督促指导、梳理总结，确保落实见效。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 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记者10月17日从教育部获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新时代高教40条”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推进，高校办学更加聚焦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成效显著。但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还不够巩固，一些学校领导精力、教师精力、学生精力、资源投入仍不到位，教育理念仍相对滞后，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仍不够聚焦。“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振兴本科教育，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经过5年的努力，“四个回归”全面落实，初步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建设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引领带动高校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全面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师育人能力显著增强；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健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高等学校质量督导评估制度更加完善，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

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德才兼修，提升思政工作质量，强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强化管理服务育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能力，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改革评价体系；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区域专业布局；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重塑教育教学形态，大力推进慕课和虚拟仿真实验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深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深化国际合作育人，深化协同育人重点领域改革；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完善质量评价保障体系，强化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强化质量督导评估，发挥专家组织和社会机构在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切实做好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工作的组织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高校主体责任，加强地方统筹，强化支持保障，注重总结宣传。

同时，为实施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教育部与相关部门还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农科教结合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

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等文件，对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具体安排，明确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在系列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1.0 的基础上，通过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扩大了各个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强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力度，提升了改革发展的质量内涵。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加强校园食品安全防控工作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落实责任，强化措施，防控校园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校园食品安全关系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务必严之又严、细之又细，确保安全。近年来各地在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主体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宣传教育、推动社会共治等方面出实招、求实效，积极推动落实学校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教育部门的行业管理责任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部门监管责任，但当前校园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食源性事件时有发生。

会议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校（园）长负责制，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教育，督促学校食堂规范化管理，全方位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督导检查，严肃查处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渎职行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落实网络订餐平台责任，加强营养健康和

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学校要切实担负起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对大宗食品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建立稳定的供货渠道；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鼓励家长委员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会议强调，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必须严字当头，责任到位。各地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和制度，依法依规快速开展应急处置，及时妥善回应社会关切。对引发食源性疾病的供餐单位和承包公司实施联合惩戒。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副主任、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体育卫生艺术司、广东省教育厅、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大连轻工学校负责人发言。各地食品安全办、教育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参加会议。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 2018 年第 6 号预警：“培训贷”里有陷阱，广大学子别盲信

近期，广大高校应届毕业生进入求职应聘的繁忙时期。有媒体报道，一些不法培训机构利用学生在求职季急于找到工作的不安心理，表面上为学生设计各种培训计划，作出提供兼职、实习、内推就业等虚假许诺，鼓吹接受“培训”后直接安排就业等，实际上在培训协议中嵌入贷款合同，但并未提供实质性的培训内容，使许多学生在不清楚合同内容的情况下背上了高利贷，卷入“培训贷”层层陷阱。

在此，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次发出预警，提醒广大学生务必保持清醒、提高警惕、明法用法。

第一，保持清醒。广大学生在求职应聘等关键时期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轻信天花乱坠的宣传，细

心识别不法机构精心设置的诱饵。要通过学校等正规渠道寻找实习兼职或求职机会，对社会培训机构的资质和培训内容要进行深入了解和确认，不要“有病乱投医”，被不法机构和人员“忽悠”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付出任何成本就能得到好处背后一定隐藏着陷阱，千万不要上了骗子的当。

第二，提高警惕。广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签订相关合同时，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内容，弄清楚实际资费标准，不要盲目信任“熟人”、不要随意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不要在未“吃透”合同条款的情况下轻易签字。签字画押就意味着要负责任，负不起的责就别签字，千万不要干自己请客却让家长买单的事。要多了解熟悉金融常识，遇到不清楚的问题时，多咨询请教老师、家长和学长，谨慎一点没坏处，多长一双眼睛没坏处，提高自己对“培训贷”及其隐身产品的甄别和抵制能力。

第三，明法用法。新时代的大学生要自觉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学习，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做个知法、守法的现代人、理性人。要明晰个人经济活动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注意留存相关凭据，当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第一时间报警，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同时再次郑重提醒广大大学学生工作者和资助工作者，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密切关注在校学生的大额经济支出，及时向学生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宣讲不良“校园贷”及其各类变种的危害，避免学生落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避免小问题酿成大问题。

陕西省扩大高级职称自主评审范围

近日，陕西省人社厅印发《关于扩大高级职称自主评审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持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在陕西省高等院校教师系列职称自主评审工作基础上，将高级职称自主评审范围扩大到省级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省级三甲医院等单位。

《通知》对自主评审范围、评审条件做了具体规定，同时指出，申请高级职称自主评审的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通过并报省级主管部门（市属单位报市级主管部门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同意后，向省人社厅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通知》明确，省人社厅会同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申请单位进行综合评估，综合评估包括审阅单位申报材料、实地考察、民意调查、听取职工代表意见等环节。评估通过的单位可设立申请系列（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

《通知》要求，开展高级职称自主评审工作是深化陕西省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协调配合，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认真执行国家和陕西省职称制度改革政策，建立职称评审工作“双随机、两公示、四公开”制度、巡查抽查制度和倒查追责机制，积极指导用人单位正确行使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科学有效、公平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员，营造人才成长良好氛围，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一带一路”能源电力高校及产学研联盟成立

10月26日，“一带一路”能源电力高校联盟以及“一带一路”能源电力产学研联盟在上海电力学院成立，联盟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等颗颗珍珠串联成一条耀眼的纽带，携手为“一带一路”建设培育“光明使者”。

据了解，电力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明星领域。据统计，5年来，中国电力企业在“一

带一路”参与国家签订电力工程合同494个，总金额912亿美元，给诸多电力短缺的国家和地区送去光明和发展机遇。“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欢迎。泰国那空帕农大学校长菲特山那冯·万昌特胡威克表示：

“每一个新建和运行的电力项目都急需大量优秀的电力国际化人才、当地电力运维和管理人才。我们要学习和共享优质的电力教学和科研资源，与上海电力学院、与其他各国电力高校的国际合作太及时、太重要了。”

上海电力学院党委书记李明福介绍，为了服务“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该校发起成立了国际电力高校联盟（ADEPT），得到了来自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越南电力大学、马来西亚国能大学、莫斯科国立研究大学（原莫斯科动力学院）、德国布兰登堡科技大学的积极响应和参加。今年，联盟进一步扩容，又有蒙古科技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巴西坎皮纳斯大学以及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申请加入联盟，并成立了联盟理事会，选举上海电力学院为理事长单位。

国际电力高校联盟理事会理事长、上海电力院校长李和兴表示，“一带一路”能源电力高校联盟以及“一带一路”能源电力产学研联盟是国际电力高校联盟的延伸与扩充，联盟以“高校+企业+国际机构与国际组织”的形式，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电力需求及发展。来自越南、斯里兰卡、泰国、巴西、印度尼西亚、蒙古、俄罗斯、澳大利亚、英国、塞尔维亚、荷兰等国的18所高校、企业，以及塞尔维亚尼古拉特斯拉博物馆、荷兰尼古拉特斯拉研究院等著名国际机构和国际合作组织都已加入。联盟成员一致倡议：将遵循开放、共融、共享、共赢原则，着力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组建电力产学研联盟共同体、创立能源电力协同创新平台、建立能源电力国际合作中心、设立能源电力创业事务中心，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和相关企业，推动能源行业创新发展，服务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

湖南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名单出炉

10月26日，备受关注的我省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项目名单终于出炉！“双一流”建设高校共四所，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湖南师范大学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7所高校入选“国内一流”建设高校

名单显示，我省“双一流”学校建设项目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四类。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共有4所，其中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湖南师范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四所高校也是我省入围国家双一流名单的高校。

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为A类和B类共有7所。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入围A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南华大学入围B类。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有B+学科的为A类；有B-学科的为B类。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分别是湖南工业大学、吉首大学、湖南商学院、湖南理工学院，均为今年我省调整进入本科一批招生的高校。而衡阳师范学院、湖南工程学院、湖南文理学院、长沙学院、邵阳学院、湖南城市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7所院校则入围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236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与此同时，今天还公布了本科院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名单，同样也分为四类，分别是：12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64个国内一流建设学科、80个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和80个应用特色学科，共计236个学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去年国家公布的“双一

流”建设学科，湖南共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四所高校的12个学科入围，此次，这12个学科直接认定为我省“世界一流建设学科”。除世界一流建设学科以外，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及以上的学科，经学校申报，可直接认定为我省“国内一流建设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B-及C+的学科，可直接认定为“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应用特色学科”则采取学校根据指标限额推荐申报、专家择优遴选的方式确定。

据统计，中南大学共有33个学科入围“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居榜首。湖南大学紧随其后，共有29个学科上榜。湖南师范大学共有21个，总數位居第三位。国防科技大学共计有16个入选，湘潭大学共有15个入选。

将建立“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体系

记者获悉，我省要求各高校要采取有力措施，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相应实施“双一流”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团队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科学研究计划和产学研平台计划，确保实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确定的战略目标。湖南省将建立“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体系 and 动态调整机制。

浙江政策引导毕业生涉农创业

近日，浙江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做好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相关政策衔接落实工作的通知》，给予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连续补助3年。

此次补助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在省内专职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达到一定规模（含家庭农场、具体由县级政府规定），承包土地期限在5年以上并签订规范化承包（流转）合同的；牵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任理事长，

并被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为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在经主管部门评定的县级以上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在一年以上，办理相应社会保险，年基酬不少于2万元的。

据了解，自2011年开始，浙江对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给予补贴，欠发达地区每人每年1万元、其他地区5000元，连续补助3年，目前已补贴大学毕业生近2000人。文件出台后，原已享受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补助且尚未满3年的，从2018年开始，按新标准进行补助，时间不重新计算。

广东省教育厅公示新一批“上岗退费”人员名单

10月23日，广东省教育厅公示2017—2018学年申请“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的人员名单，全省共有2691人符合条件，按照10月8日施行的《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上岗退费实施办法》，他们将享受到更高的退费金额，标准从此前每人每年6000元，上调至8000—12000元不等。

今年是广东省实施上岗退费政策的第11年头，为进一步吸引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10月8日起正式上调退费标准。

根据《实施办法》，2018年起，上岗退费标准按照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5年；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每人每年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4年；专科学历每人每年8000元，其中艺术类（音乐、美术、舞蹈）、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并担任对应学科的教师每人每年12000元，退费年限为3年。由申请人到教师岗位工作满1年后，按标准逐年退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厅统一安排。

此次公示符合上岗退费条件的2691人中，全日制研究生学历40人，本科学历（学士学位）1749人，专科学历902人。

《实施办法》也调整了享受上岗退费政策的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及暂缓就业的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毕业生，或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其中，通过“公费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等方式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不再享受上岗退费政策。

适用地域范围和学校类型包括汕头、韶关、湛江、肇庆、茂名、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潮州、揭阳、云浮等14个地市以及江门恩平市的乡镇（不含县城所在镇）及乡镇以下的中小学校（包括全日制公办和民办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以下简称农村学校），以及全省各级特殊教育学校。

《实施办法》明确，上岗教师应按照协议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农村学校（特殊教育学校）任教，任教服务期不少于5年（其中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服务期为6年）。上岗教师在服务期内可在所在县域农村学校间流动，可参加教师在职进修或培训，但不得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不得报考脱产本科生和研究生。

上岗教师在服务期内违反协议有关规定的，县（市、区）教育局应通知本级财政局停止退费，要求上岗教师退还以前年度已领取的补助金额并缴纳违约金，退还的补助金额及缴纳的违约金由县（市、区）教育局统一退缴本级财政局，统筹用于教师培养培训工作。

北京市设立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

10月17日，北京市财政局公布《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管理办法》。为推进北京高校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北京市设立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高校“双一流”建设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其中“一流专业”在5年建设周期内，每个专业最高可获3000万元支持，“高精尖”学科最高则将获得5000万元的财政支持。

按照管理办法，高校“双一流”建设以5年为

一个建设周期，实行总额控制、分年申报，重点支持以下四类项目：1.北京高校“一流专业”建设；2.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3.北京市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建设；4.央属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

其中，北京高校“一流专业”建设采取项目管理方式，在建设周期内将按照每个专业最高3000万元的总额予以支持，经费管理将参照《北京市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要求不得提取间接费用；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也同样采取项目管理方式，在建设周期内按照每个学科最高5000万元的总额予以支持。

北京市属高校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则将根据学校已公布的建设方案按需予以资金保障，经费管理将按照《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国家“双一流”建设央属高校，将按照对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采用因素法给予补助资金。

北京市财政局要求，高校双一流的“建设资金”，不得用于偿还贷款、支付罚款、捐款捐赠、赞助支出、对外投资等支出；也不得用于房屋建筑物、基础建设支出；不得作为其他项目的配套资金以及国家规定不得列入的其他开支。北京市财政局，将对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项目实行动态管理，依据绩效评估和考核结果，来调整资金分配。

重庆市高校出台举措强化本科教学

日前，为加快振兴本科教育，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本科教育教学秩序，严格过程管理。近日，记者从重庆市多所高校获悉，各校纷纷出台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学风整顿。

记者从西南大学了解到，该校严格加强学习过程的考核，要求真实、完整地记载学生的学习过程

和所有成绩，无故缺课、缺交作业、缺做实验累计1/3以上的考生，不能参加课程的考核；学生在校期间必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累计达12学分（重修合格的的不计），学校对其给予书面学业警示，累计达24学分，给予退学处理。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高校则会在进校三个月后对学生进行复试。

“新生专业复试后，如果发现高考有舞弊行为、明显不符合高校培育水平的，会取消入学资格。”四川美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会对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10分以上的学生予以学业警示，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达20分的学生编入下一年级就读。

对于毕业论文抄袭、代写、买卖毕业论文等违纪问题，教育部要求严格实行论文查重和抽检制度，建立健全盲审制度。

对此，重庆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均已开始对本科所有毕业论文（设计）实行查重检测工作，以确保本科毕业生论文（设计）质量。

记者了解到，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等高校，目前已取消“清考”制度。“清考”，即对于课程期末考试没有通过、补考也没有通过的学生，学校在毕业前再给一次或两次考试机会。

多所高校对学生学业念起“紧箍咒”

学分不达标，本科变专科；考试不过关，有可能退学、留级……近日，多所高校一改“严进宽出”的培养模式，对学生念起“紧箍咒”，“严进严出”正在成为一些高校的普遍做法。

整治学风严把“出口”，体现了高校从严治校、提升办学质量的决心。多名受访者认为，“严进严出”的同时，更应提升教学质量，注重学生差异化精准管理。

多所高校齐亮“铁腕”

由于学分不达标被亮红黄牌，华中科技大学18

名学生从本科转为了专科。学校教务处表示，“本科转专科”政策自2018年起施行，是保障本科生培养规格和质量的重要举措。学分未达标受到红牌警示或者累计两次受到黄牌警示的，实行本科学业淘汰机制。

一些职业院校也开始“铁腕”整治学风。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在公示期满、学生申诉期结束后，对2017—2018学年学生中经补考后学业成绩未达到要求的22名学生予以退学，40名学生予以留级。

云南大学已经将“严进严出”纳入日常管理的点点滴滴。以考试为例，云南大学学业成绩分为三部分，平时成绩和期中考试各占20%，期末考试占60%，一旦补考不过就必须重修。与以往“60分万岁”不同，云南大学现在要求学生平均分必须达到70分才能拿到学位证。

2018年云南大学共有4119名毕业生，有220人因为学分未修满等原因无法按时毕业。“还有6名学生被要求退学。”云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周海燕认为，必须严格执行制度，否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对制度本身也是一种践踏。

“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家庭能够放心把孩子送来学校并学有所成，必须不留情面处理少数不读书的学生，以此在每一个学生心中树立‘不学习就会退学、留级’的危机意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立说。

以学风整治破除高校教学质量“恶性循环”

华中科技大学一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有些大学生脱离教师和父母管束就像脱缰的野马，通宵打游戏、逃课，考试挂科的情况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高校就读的每位学生都能拿到国家下拨的培养经费。而很多学校原本招生都招不满，让他们再退学一部分不合格的学生，是很难的。”苏立说。

对于不少教师、高校来说，学生科目考试通过率低、毕业率低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

一些高校考前划重点、开卷考试。为了不影响“毕业率”，一些高校还实行“清考”制度：在临近毕业前，学校会统一安排一次对未及格学生的补考，只要清考能过，毕业证、学位证照拿。

“大学生们经历高考的千军万马后进入大学，承载了很高的社会期望值，如果松散管理，不仅对不起学生4年的大学生活，也无法匹配社会的需要。因此，在校期间的‘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周海燕说。

“严进严出”更应加强教学质量、注重精准化管理

“学校敢于对挂科的学生说不，教师上课更有底气。只有实行‘严进严出’，才能根治多年存在的学风顽疾。”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丁加勇说，本科淘汰是全世界高校的通行做法，特别是国外著名高校本科淘汰率都较高。

不少专家认为，整治学风不能仅对差生“一退了之”，还需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培养方式。

首先要严格日常管理和行为管理。“过程管理很重要，只有平时加强管理，注重在学习和就业等方面的引导，才能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李春波建议，针对部分学生荒废学业的情况，高校应严格日常教学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注重加强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

其次，在刚性要求日益体现的同时，可以根据学生成长的差异化现象精准管理。“比如，能否推行弹性学制，学生毕业后两年内可以选择择期回校重修学分或延迟毕业。”周海燕说。

丁加勇还建议，从严治校之下，高校对于学生的惩戒警示制度越发完备，与之匹配的学生申诉、第三方仲裁机制也应随之完善，才能让制度在法治轨道上“合情合理”。

“如今各校铁腕整治学风已成趋势，大学生们一定要引以为戒，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不辜负自己的前程。”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杨同学说。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应对教育变革重大挑战 创新教育研究资助体系 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重要作用，深刻分析了我国自主创新面临的形势任务，为坚定创新信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指明了方向。教育的发展亟需创新，不仅要传承好人类过去积累下的丰富知识和技能，还应面向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着眼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教育还必须基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心规律，遵循学与教的客观规律，才能达到优质、高效。教育的主体是兼具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教育实践本身是人-人、人-客观世界、人-认识客体等构成的复杂系统。因此，现代教育改革发展，必须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医学、信息技术、系统科学等多个学科，围绕教育革新的关键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相关学科建设相对分离，对教育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缺乏，还不能满足国家对于教育创新的重大需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建立针对教育问题的多渠道资助体系，将有利于打破学科间的藩篱、开展重大多学科交叉研究，对我国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教育改革发展呼唤教育科学研究创新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还面临着诸如质量、公平、个性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目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导致关于脑和认知、学习等人的发展的基础性科学问题尚未突破，对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而与此同时，教育对象和教育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智能化的学习环境及自主学习活动将成为未来学习的新形态。教育发展改革的现实需求，对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因此，研究新形势下人类知识及文明的传承、人类个体脑发育、学习和认知发展规律，已经成为未

来教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为迎接教育改革发展对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提出的全新挑战，世界各国陆续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设立了面向教育科学的研究基金或重大项目，将研究焦点集中于破解教育改革的重大问题。早在 2002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等四家权威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就联合发表了《教育中的科学研究》报告，指出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学习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当前国际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热点问题（如 STEM 教育，网络在线课程，基于脑认知的学习科学，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等），无一不是自然科学深度介入的结果。从 2015 年起，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教育科学研究基金和美国联邦教育部、盖茨基金会等多个机构联合资助，心理学、神经科学、教育学、信息技术、数据建模等多学科专家再度发起围绕人类学习、学生学习的新一轮跨学科研讨，反映有关学生学与教的最新多学科研究报告即将发布。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长期以来更多依据经验，重思辨。因此，在面对复杂的教育现象与动态变化的时代需要时，缺少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和灵活应对问题的能力。同时，随着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为研究教育中的大规模复杂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工具。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亟待更加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完善自身研究体系，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

教育科学研究创新呼唤创新教育研究资助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主要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体系中获得支持，只有少量研究得到自然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的支持。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主要的国家级资助渠道是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属三个单位主要负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被区别对待。这样的科研基金体系存在学科类型的

边界区分过于清晰、学科下设分类过多过细、跨门类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缺乏内在关联性等问题，不利于大规模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分析以往国家层面对教育科学的资助情况，发现其呈现资助范围覆盖面广、但以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研究相对较少；总体资助强度不够且尚未形成重点资助领域，没有重大研究成果产出；跨学科的资助相对较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用不足等特点。

教育研究是一门系统性很强的应用导向科研活动，需要跨学科的科学家人整体布局，联合攻关。教育研究中的问题，类似于生命科学中问题，需要“活体”研究理念，“成像”的观测技术，加上跨学科的知识，才能切实解决。我们以往主要是将教育科学研究定位于社会科学领域，强调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总结教育规律，从而为教育的宏观管理、微观教学实践提供依据，重在应用研究；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虽然在信息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资助了一些教育相关的基础研究，但主要资助的是宏观的教育管理层面的项目，定位于探索教育公共管理的方法创新，而非针对教育研究本身的基础研究。当前教育学科的自然科学属性对学科发展越来越重要，尤其近年来在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心理学、信息技术、复杂系统等领域中取得了不少突破性进展，需要整合质性和量化两种研究范式，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科学问题。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根源之一是许多瓶颈性基础科学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破解。为促使自然科学，比如认知科学、脑科学、信息科学等，围绕教育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协同创新亟待加强，创建新的研究资助方式成为关键性因素。为此，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力推动下，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讨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中写入了“鼓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探索支持教育科学研究”。2017年，教育部联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如何支持教育科学研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制度设计工

作。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协同界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教育科学基础研究的目标、范围、方式、力度、路径，实现中国教育科学基础研究支持体系的制度性创新。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创新将具有破解中国教育难题、实现人力资本强国的重要战略价值，将有力推动在新信息技术环境下教育的质量、公平、个性化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教育科学研究的创新举措

在充分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从2018年开始，在原有教育学相关代码如G0407 教育管理与政策、C0911 行为科学信息学、C0912 神经信息学、C0913 学习和记忆等基础上，新增F07 信息科学技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其中第一个二级代码就是F0701 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该代码资助信息科学与技术和教育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新环境下教育信息科学基本规律和基本模型，研究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创新和人的发展规律。F0701 下设十个三级代码，分别资助“教育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与方法”“在线与移动交互学习环境构建”“虚拟与增强现实学习环境”“教学知识可视化”“教育认知工具”“教育机器人”“教育智能体”“教育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学习分析与评测”“自适应个性化辅助学习”等。

通过设立上述代码，强调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方法，将前沿科学、新兴技术的突破与教育研究深度融合，构建以人为研究的基本对象，以人的发展作为研究核心的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在基础规律、环境方法、实践创新三个层面开展深入的研究。

基础规律是教育研究问题域框架的根本，是整个教育研究问题落地的前提，同时也是支持建设新时代教育强国的重要依据。深层次探究新时期教育基础规律，对构建适合国情的教育服务、教育治理、教育评价以及教育供给模式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对人类的脑认知规律、教学的交互规律以及知识生产和进化规律等认识的深化，将从根本上解决“教什么”

“如何教”等核心问题。

环境方法是教育研究问题域的保障，是整个教育研究问题得以实施解决的重要支撑。不断发展教育教学中的环境方法，既为下层基础规律探究提供新的工具和方法，还将为上层实践创新创设有利于改善学生学习效果、提升教师教学效率、实现教育有效治理的技术支撑。

实践创新是教育研究问题域的关键，是将基础规律探究成果落地应用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检验基础规律层探究发现新规律的唯一标准。以规律为基础、方法为支撑，不断实践创新，既有利于促进底层基础规律的深入探究，同时还有利于为中间层形成一批具有可供示范的教育产品与工具。

基础规律、环境方法与实践创新，并非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三个独立层次，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基础规律是整个领域框架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研究均是围绕基础规律进行开展，并最终回归到深层次的规律认识和应用；环境方法层是整个领域框架中的支撑层，具有上下承接的作用，实现将基础规律的发现转变为实践应用，并同时将实践应用的结果反馈给基础规律的探究；实践创新层是教育研究问题域落地应用的抓手，是检验基础规律的唯一途径和标准，是整个领域框架的关键。

新的教育科学研究资助体系的建立对系统推进教育基础研究，促进科教深度融合，构建教育创新的新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将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在教育学科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新的研究资助体系下，协同开展教育科学的基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我国作为创新能力迅速提升的大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快、潜力大，教育特别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研究如果能够及时布局并汇聚资源，将可能快速

取得突破，从而为我国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为世界教育科学的研究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引领学科发展。

应对重大需求，抓住信息技术内生动力特点，着力揭示互联网+时代的教育规律。结合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探讨互联网+教育新生态体系中的基本规律，如智能化学习环境构建、群体学习过程的量化分析、学习评价机制与方法和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治理等。

鼓励科学家跨学科组织研究团队，开展多学科交叉教育科学研究。根据申报指南，鼓励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脑与认知科学、管理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探究新技术带来的教育体系重组和流程再造过程中的理论与应用问题，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整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大数据记录了教与学的过程，为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研究素材，鼓励积极开展基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教育科学研究探索，创造性的发现教育规律，为我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政策支持。

坚持教育问题导向，科学研究为教育创新服务。开展教育科学基础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教育真实问题。围绕问题建立多学科交叉团队，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揭示问题产生原因、机制和干预方法，聚焦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的技术与方法来解决教育问题，最终目的是改善教育实践。

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创新，树立中国教育自信，需要高质量的研究为教育决策提供支撑，需要科学的决策为教育发展提供行动指南，需要高效的创新破解教育难题。要鼓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开展交叉研究，协力攻克教育创新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凝练教育基础理论前沿和创新的科学问题，共同探索教育科学基础研究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一流教育研究人才队伍，提高我国教育科学

研究水平，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持，为助力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董奇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12期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为未来而学习：面向21世纪的通识教育

未来是发展重新定义的变革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教育革命加速袭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向纵深推进，科学技术的突破、人类生活的改变、产业形态的变化前所未有，突出表现为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颠覆性科技的群体崛起，这些时代变革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格局、人才需求的结构和未来学习的模式。面向未来，高等教育如何因应时代变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是所有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深思并解决的问题。

未来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正日益成为全面互联、良性互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全球交往、伙伴合作的共同发展愿望，并孕育着革命性发展的端倪：全人教育思潮引领全球高等教育变革，教育资源跨境流动共享成为常态，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推动着教育教学创新发展，大学从实体大学向虚拟大学转变、从封闭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变，教育教学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例如密涅瓦大学开展“沉浸式全球化体验”教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启动“开环大学计划”、打造全球开放式校园等，均是顺应这种转向发展的典型实例。

在未来学习时代，人机将共生共存，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协同的模式促使我们不断向学习领域延伸，构建教与学增强的新空间。这种学习空间或环境由学生、教师、平台共同组成，其中，学生是探究者、发现者、合作者，教师是支持者、引导者、组织者，平台在虚拟空间、现实空间和智能空间并存，具有协同开放、多维共生、智能增强的特点。一是人机协同将

解放教学生产力，使教师更加专注于教学创新。二是人机协同使个性化学习逐步成为主旋律，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三是人机协同使教与学两者间的交互耦合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形成人机共生的学习系统，可以时时刻刻地学习。

从教育供给来看，大学将进一步适应高等教育信息化、全球化的急剧变化，重新审视人才培养体系，在培养理念、目标、模式、方法等方面作出转型与发展的重大判断，并以此驱动未来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培养理念上，将更加强调全面发展、终身学习和整合协同育人。在培养目标上，将帮助学生进一步拓展社会批判、跨文化认知和国际化能力，进一步深化对生命、生态、环境的理解，追求个性化卓越。在培养体系上，将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建立开放多元的体系。在培养模式上，将关注多专业跨专业培养，通专结合和产学研结合，发展实践性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将推进基于互联网、慕课和大数据的教学改革，实现教和学的联动协同自组织过程，通过情感隐喻来进行对话和体验式教学。

从学习需求来看，学生将从学习者的视角，开展基于个性和兴趣、不受时空限制的学习，以问题或主题为导向，更加强调协商和协作。在学习目标上，学习不再局限于特定学科的专业塑造，更加注重通识教育，更加注重能力素质培养，通专融合、通跨融合成为主流。在学习方法上，新的教学思想和新的技术手段深度改造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师生成为学习的共同体，更加偏爱开放式、泛在式、个性化的在线学习。在学习空间上，教学活动场所加速全球移动，伴随信息网络的放大和认知技术的增强作用，实现多次数、多地点、多时段的共同学习，实现不同群体的共同学习、协同学习。在学习资源上，资源体系将更加开放，逐渐由封闭转向共享，形成全球流动的格局。

因此，在全人教育理念、信息科学技术、资源共享需求的联合驱动下，未来教与学的方式将发生新的重要变化，形成一些新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动力转换，教育教学将由以教育者为引领转向

以学习者为中心，更加追求内涵发展，更加呼唤品质教育。二是教育理念更新，教育教学将由专业发展转向“通”“专”“跨”连贯发展，更加强调全人教育、终身教育，更加突出开环教育、整合培养。三是教学体系变革，教育教学将由物理空间办学转向新式空间办学，教育教学资源将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学习的自主性、交叉型、探究式、协作化特征更加明显，“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的教育新范式将深刻改造传统教育教学模式。

21 世纪通识教育的使命与构想

面对教育教学的变化趋势，通识教育为我们指明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为发展着的全人教育理念，通识教育正在回归尊重生命的教育本源，提供更多基于智慧创造、协同合作、意义建构的教育体验，迎来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新阶段。

19 世纪的通识教育以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典型代表，主要是作为专业教育附属的自由教育，是少数人的教育，旨在培养国家统治者和少数社会精英阶层，传授单纯注重思维训练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几何、文法、修辞、宗教、道德教育等古典课程内容。

20 世纪的通识教育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为典型代表，在原来的自由教育基础上发展为具有核心地位的教育模式，是全民的、民主的教育，主张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和民主制度的捍卫者，通过通识课程等传授广博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在全球范围内，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正在逐步形成，以中国研究型大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大学呈现群体崛起之势。伴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变化，21 世纪的通识教育极有可能在以中国研究型大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大学形成并得到创新发展。这种新的通识教育是在借鉴 19 世纪、20 世纪通识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开展的全人教育，主要推进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世界公民，带领受教育者感悟综合交叉的知识、形成全球发展的能力、涵育人文科学的素质、培养奉献家国的

人格，推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交叉培养的深度融合。其主要特征表现在：

第一，21 世纪的通识教育致力于传授宽厚的知识。未来的知识更加追求结构的互联互通、链接成网，强调知识的宽广精深、层次嵌套。21 世纪的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享受全方位教学的新探索，在课堂教育、慕课教学、移动学习、网络平台的创新互动中，建立广博深厚的知识结构、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形成开阔的见识、深入的认知、跨界的经验，使宽厚的知识成为学生引领未来的基础。

第二，21 世纪的通识教育致力于锻炼卓越的能力。未来的能力更加呼唤知识建构，讲求深层次学习基础上的新智慧建构、方法论建构。21 世纪的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体会全过程培养的新模式，在第一课堂课内学习、第二课堂校内实践、第三课堂社会实践、第四课堂全球交流的协同培养中，学会思考、学会批判、学会选择，形成预判趋势的洞察力、整合资源的创造力、把握全局的领导力，使卓越的能力成为学生引领未来的关键。

第三，21 世纪的通识教育致力于培育全面的素质。未来的素质更加关注自我激励和交互培养。21 世纪的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参与全员育人的新实践，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意识，在跨专业、跨年级、跨年龄、跨兴趣的互学共进中，重获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形成沉稳干练的气质、开放包容的胸怀、坚毅果敢的品行，使全面的素质成为学生引领未来的保证。

第四，21 世纪的通识教育致力于塑造健全的人格。未来的人格更加聚焦思想品德，通过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培养爱国报国、爱民为民的理想信念。21 世纪的通识教育可以让学生感受立德树人的新氛围，在中国特色、国际比较、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领悟中，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内省自我的本能、关怀生命的情怀、服务社会的信仰，使健全的人格成为学生引领未来的根本。

21 世纪通识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在 21 世纪通识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高校要不

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倡导全人教育理念,开展“知识-能力-素质-人格”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在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第一,推行以强化特色、提升层次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在培养特色上,要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求是创新、追求卓越。在教育体系上,要实现开环协同,提升精英人才和领袖人才的培养能力,推进前端开环,共享校内资源;推进内部开环,完善生态系统;推进后端开环,链接校外资源。在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上,要注重因材施教,努力遴选拔尖生源,完善学生评价机制,强化交叉培养,逐步实行全程导师制,营造国际化教育的浓厚氛围。

第二,推行“知识为本”转向“能力为本”的教学改革。在培养机制上,要以学生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专业引领和人才识别功能,探索团队学习及其评估方式,提升科研对学习的溢出作用,促进学习全过程的系统优化,加强就业创业支持,探索基于能力提升的多元评价,充分激发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在高端教学资源上,要汇聚各学科最顶尖的教授及教学团队,链接全球办学资源,打造开放式、国际化的课堂,在全球布局中拓展学习实习实践的基地。在特色教学组织上,要组建多元化、交叉型的课程委员会,围绕能力建构培养单元及课程体系。在体验式教学上,要促进师生互动和共同实践,让学生在教学中主动、真实体验。

第三,推行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学习模式创新。在各类教育协同中,学生要以通识学习为基础、以专业学习为根本、以交叉学习为特色、以思政学习为引领,努力掌握多学科的思维方法,培养专注的研究习惯,形成创造性的认知结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四种课堂融合中,学生要通过课内学习积累系统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校内实践增强创新与团队合作精神,通过社会实践链接专业能力与社会需求,通过国际交流拓展全球视野与竞争力。在学习平台联动中,学生要感受课堂学习方式变化,积极参与研讨互

动;把握慕课学习机会,主动接受全球名师传授;利用移动学习环境,随时随地进行沉浸式学习;融入学习网络平台,快速整合海量的学习资源。

面向未来,高校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结合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要求,积极响应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全面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的战略机遇,主动迎接未来学习变革,坚定不移地推行连贯“通”“专”“跨”的通识教育,打造一流的教育教学品牌,为国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贡献高等教育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来源: 《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15/16期

审核评估视域中高等教育秩序的重构

一、引言

国际上,审核评估已成为所在国家高等教育秩序的动态调节器,具有反思性的高等院校成为多元化高等教育秩序的主动建构者。中国高等院校多数源于20世纪50年代因应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行业人才培养需求而开办的行业培训机构,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传统。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从欧美借鉴了大量的相关元素,对单一的计划教育秩序有所改造,但持续20多年的标准化教学评估事实上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和单一化,高等教育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失衡,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需要。审核评估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的检测工具,这势必引发高等教育秩序的张力和裂变。审核评估在中国尚是新生事物,相关研究还处在概念解释、政策解读及具体操作的思考上,未关注到审核评估的竞争本质及对高等教育现有秩序的内在影响。这个问题的阐述有助于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审核评估和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增强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高校的自我角色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二、审核评估关联性制度及其作用

(一) 审核评估的现实基础及关联性制度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最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不能满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提出了审核评估,确立了基本框架:“加强高校自我评估,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并于2013年正式实施于高等教育领域;《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人

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总要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号)明确指出: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公平竞争”“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2015年10月21日)的目标是“破解转型发展改革中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等突出问题”。从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及围绕改革而出台的组合政策来看,高等教育改革的常态将是持续解决“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从实践层面改变原有的高等教育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改变建立在相应的评价机制变革的基础上。

(二) 审核评估将重构高等教育秩序

审核评估是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了国际评估经验而推出的一种全新的评估模式。与以往教学评估的最大区别在于国家层面不再提供确切的标准和具体指令,只提供抽象规则,把所有的细节交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院校,由他们根据各自的知识和技术去行动,为高校的竞争性发展预留了空间。这种设计至少在政策文本上体现了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意图,但在实践中如何,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以一种弱设计的方式,引导高等教育行为主体,充分利用属于自己的知识和从市场中得到的对自己有助益的他人的知识,通过提供优质高等教育产品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既体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意图,也体现了对高等教育行为主体的赋权和责任划分,同时也向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审核评估将产生两个可能的变化:

一是改变高等教育的外部生态，原有的国家高度集中管控的局面会有所松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会有所扩大，高校的省际差异性发展会日益明显；二是随着省级教育统筹权的增强，要求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会成为各省的自然追求，地方高校必须精准定位，各司其职，办出特色。这两种变化将从不同角度冲击原有的高等教育秩序，重构高等教育秩序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求。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审核评估是一种基于校本的评估制度，包涵着去同质化和多样化追求，要求学校呈现出自身特色和办学逻辑，实际上暗含着不同高等教育形态及类别的价值竞争。审核评估作为制度设计，将贯穿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在宏观层面，审核评估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旨在通过加强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宏观管理和分类指导，引导高等学校合理定位，全面落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中观层面，审核评估要求高校梳理及定义其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及相应的制度，检测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度。微观层面，审核评估重视落实办学目标的日常操作机制及过程性质量监控，将目标、计划、过程与结果联结在一起，强调高校自身的特性与生命力。因此，审核评估的价值追求是去同质化和去单一化，试图建构一种基于多样化和特色化竞争发展的高等教育新秩序，从而达到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

（三）审核评估的主体

前两轮评估（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均是由国家政府主导，由其制订详细的评价标准，并用同一套标准评估全国高校。在整个评估过程中，高校是被评估的客体，只能削足适履，迁就外部评估。高校既无主体地位，也无自主空间。评估主体的角色基本上由国家政府垄断。尽管审核评估仍由国家政

府统筹，但其目标是“管评办分离”。可以预见，当社会组织发育到一定程度，出现能够独立开展评估的专业组织，足以支持管评办分离时，审核评估的主体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有沿袭传统的政府体系内的相对独立的权威部门，高校自身也会获得评估主体的地位，同时还会出现基于市场竞争的服务商，以及公益导向的评估专业协会等。审核评估的具体实践与功能取向对高等教育秩序的影响将视评估主体的差异而定。当政府体系内相对独立的权威部门作为评估主体时，其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审核评估行使的就是监督与调控功能，将在宏观层面影响高等教育秩序；当服务商和评估专业协会作为评估主体时，审核评估的功能便是提供专业服务，将在中观层面影响高等教育秩序；当高等院校自身作为评估主体时，审核评估的功能便是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从微观层面影响高等教育秩序。

三、高等教育秩序的现实境况

《辞海》对“秩序”的解释是：“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秩序与位置相关，即秩序决定和规定位置关系。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秩序是组织的规则和程序，有什么样的秩序概念，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一）关于高等教育秩序

对高等教育秩序进行比较系统探讨的是李静蓉（2007）。她借用了哈耶克自发秩序和计划秩序的概念，却改变了其内涵。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之意是独立于人之计划外、在人之行动作用下偶然生成，计划秩序则是指由人之计划或设想建构。李静蓉将高等教育自发秩序的内涵描述为“学术自由、高校自治”的传统，这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并非高等教育主体“利用各自片面认识在决定什么是正确行为的一般性规律框架内追求各自利益时所造成的偶尔结果。”她将计划秩序定义为“学校行政权力的强化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大”，这个描述就高等教育内部而言，有其合理之处，但

忽视了高校与政府、高校与市场、高校与高校之间等多重外部秩序。另外，哈尔蒂·布荣注意到，这两种秩序之外，还有一种秩序，即“独立于人之计划与人之行动之外的自然秩序。”因此，高等教育秩序应包括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秩序、高等教育主体基于市场机理互动而生成的自发秩序及高等教育自组织的自然秩序，高等教育新秩序应是这三种秩序的和谐共生。

(二) 现有秩序在实践中的问题表征

问题一，宏观层面仍以计划秩序为主。现有教育秩序的历史根源在于国家政府集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办学与评价者于一身，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当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时，人们看到的只是这种体制的优势。当事物按新的原则进行时，原有秩序的不适应则显露无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近40年，整个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信息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从对标准化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过渡到对创意性思维品质和创新精神的要求。人才质量则交由具体的市场主体来检测，而不再由抽象的国家来安排。国家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办学与评价者这种体制不再适应变化

了的高等教育实践。前两轮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基础条件的改善、基本规范的确立等方面有其贡献，但实际上由于三者合一的强行推进阻碍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抑制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院校的内在成长动机也使他们错失了与市场主体对接、共同发展的机会，阻碍了高等教育自发秩序的生成。基于计划安排的高等院校的尊卑差异本可以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竞争来调节，促进各自特色的生成和发展，但由于高等教育固守计划秩序，未能及时变革，致使同质化和单一化的高等教育整体上落后于经济发展，成为制约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问题二，中观层面缺乏自发秩序空间。中观层面的问题便是集中管控所导致的“千校一面”，高等教育自发秩序受到抑制。通过检测校训和办学定位便可窥其一斑，因为这二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构成校与校之间互相区分的身份标识。同时它们也是高等教育秩序的组织基础和关键性的实践表征。唐智松通过对109所“211工程”大学的研究发现，校训体现了主客关系间突出主体、追求自强，个群关系间律己爱群、服务社会，德学

表1 贵州省属高校办学定位

学校	总体目标	培养目标	服务面向
A (综合类)	建设有区域特色、有国际影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着力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创新型专门人才	扎根贵州省、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积极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B (民族类)	缺失	针对贵州省民族地区的特点，突出民族特色，培养专业基础扎实、适应能力强、具有社会责任感、秉承“自强不息”精神，着重在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就业竞争力等方面，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立足贵州省、服务西南，面向全国。依托民族性综合大学优势，为贵州省乃至西南民族地区的区域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服务
C (师范类)	“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教师教育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在“十三五”期间建成教师教育特色更加鲜明、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培养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适应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立足贵州省，面向全国。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服务，为地方区域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服务
D (财经类)	建成为贵州省经济、管理类高素质人才培养基础，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研究与咨询中心，欠发达地区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中心	培养具有健康的人格心智、良好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理论功底、较强的实践能力并具有创新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高素质经济管理人才，即“儒魂商才”	以富民兴黔为己任，服务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肩负起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神圣职责，为贵州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更好更快发展提供高层次专业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撑
E (医学类)	建设有明显特色、西南一流，全国有一定影响的高水平医科大学	培养高素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续表 1

学校	总体目标	培养目标	服务面向
F (中医类)	把学校建成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产学研紧密结合,民族医药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中医药大学	根据贵州省地方经济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立足贵州省,面向全国
G (理工类)	成为西部一流,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理工大学	培养强责任、精技术、善管理、求创新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立足贵州省、面向西南、辐射全国,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办学定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H (师范类)	缺失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一定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立足本省,面向基层,服务基础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注:1. 以上信息来自《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2013 年度),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高等教育评估与质量监控指导委员会,2014 年 11 月。缺失部分表明无相关信息。

2. G 校为新建学校;H 校由原来的成人教育机构升格而成。

关系间德学兼修、以德驭学,出入世观上实事求是、创新未来等积极取向,却存在特色少、雷同多,经典少、时尚多,深邃少、浅薄多等问题。常用词语有“求实、至真、创造、拓新、自强、勤奋、乐群、厚德、至善、博学、笃行”等。这些词语其实不独为重点大学所享有,在一般大学的校训中也比比皆是。高校办学定位中存在的模糊化问题可以一个省为代表进行分析。贵州省共有 25 所本科院校(含独立院校),其中有 8 所省属高校。在省级区域中,省属高校基本上可以代表该省的高水平,对 8 所省属高校从总体目标、培养目标和务面向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如表 1 所示。

贵州大学是省内唯一一所“211 工程”高校,是名符其实的综合类大学。其余学校行业特色明显,其中有 1 所培养经管人才的财经类高校, 2 所

培养中小学教师的师范类高校, 2 所培养医务与卫生人才的医学类高校, 1 所培养民族人才的民族类高校, 1 所培养现代工业人才的理工类高校。但是,从总体目标上看,提到要建成高水平大学的有 A、E 和 G 校;要成为教学研究型的有 C 和 F。“高水平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到底只是字面上的差异,还是实质上的不同,不得而知。从培养目标上看,“创新型专门人才”、“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高级应用型人才”、“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等这些表述,基本上成了抽象符号,剥离了学校的行业特征,看不出人才的特有属性。从服务面向看,有 6 所高校明确表达了立足贵州省、面向全国的志向。这 8 所省属高校的办学定位存在很的交叉性,彼此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高校办学定位模糊化由此可见一

表 2 学科专业结构(含专业方向)(2013)

高校名称	学科专业
A(综合类)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
B(民族类)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
C(师范类)	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师范专业 19 个,师范兼非师范 2 个)
D(财经类)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
E(医学类)	医学、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工学、管理学
F(中医类)	医学、法学、心理学、管理学
G(理工类)	工学、管理学
H(师范类)	文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农学、艺术学

斑。高校的种类和数量由行政审批制决定，而非彼此竞争的产物。高校自身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有限，由于自发秩序受到抑制，事实上促成了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和单一化。这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上，贵州省8所省属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8所高校中大量开设了低成本的文科类学科专业，本应该具有行业特色差异的学校却设置了大量同质化的学科专业，基于争抢生源的无序竞争使得彼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千校一面因此而成，培养的毕业生因显示不出各自的特色和专长，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境地。

问题三，微观层面自然秩序受到破坏。高校是一个组织，组织一旦生成，就有其自身的运转逻辑，也可称之为自然秩序。作为组织的高校，不同于其他组织，尤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组织，其核心是教育。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行政化几乎是高校的共同特点。多数高校实行的是校、院、系三级管理，教师和学生依附于具体专业，被圈定在一个个的格子里，相互之间壁垒分明。三个级别的负责人均产生于任命制，形成了对上负责的科层体系。“对上负责”决定了两个事实：一是上级有目标，下级无目标，真正的教育过程不被关注；二是会议型管理代替科学管理，应急管理代替常规管理。

关于第一个事实，教育行政部门将在政府和企业中通行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引入高校，每年为高校制定考核目标，高校则把来自上级的考核目标分解到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同样地，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再进行内部分解，直到不能再分。这便是前面所说的上级有目标，下级无目标，在目标分解的过程中，将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拆得七零八落，抹掉了教育的情境性、生成性和周期性，使教育本身的过程变得不被关注。关于第二个事实，“开会”是高校的另一个特色，行政人员戏谑自己“不是在开会中，就是在通往开会的路上”。会议型管理的特点是重动员，轻行动。一个会议布置的任务

还没完成，新任务又在新会议中产生了。不同的任务叠加在同样的人身上，管理人员疲于各种应急事务，常规管理反而不在日程中。会议型管理和应急型管理恰恰说明高校管理的随意性和无序性，缺乏科学管理和常规管理机制。行政化管理破坏了高等教育组织特有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自然秩序，致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被虚化和被搁置。

（三）重构高等教育秩序已成为共识

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失序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李均从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65年的变迁分析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高等教育历程曲折，其影响因素涉及政治导向、经济驱动、文化冲突、国际借鉴、领导意志以及高等教育自身诉求，而忽视高等教育本身秩序建设，急功近利是主要因素。陈先哲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论证在以GDP增长主义为导向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中国高等教育秩序面临失序之困局，其表征为高等教育价值失落，高等教育结构失衡，高等教育制度失范。中国社会已开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第二次转型，应重树高等教育价值、重整高等教育结构、重建高等教育制度，并以此重建高等教育秩序。

高等教育秩序建立在计划基础上，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合格评估和21世纪初的水平评估，基本上解决了高等教育的基础条件建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现代大学办学意识，规范了大学教学管理，为中国现代大学建设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是，由于合格评估和水平评估的标准单一，评估过程中形式重于实质，师生参与有限，评估后的改进环节缺乏有效监督等因素，事实上导致了高等教育秩序的单一化及高等教育内涵建设的虚无化。重建高等教育秩序的共识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发展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挑战，高等教育超越现实局限引领社会发展成为新要求，这一切均需改造旧秩序，把高等教育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使之按照合乎自身逻辑的

路径发展。审核评估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建高等教育秩序，处理好政府、高校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促使高校了解自己的家底，办好人满意的大学。

四、高等教育秩序重构路径

高等教育秩序，包括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秩序、高等教育主体基于市场机理互动而生成的自发秩序及高等教育自组织的自然秩序，重构高等教育秩序是高等教育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审核评估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三种秩序的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就当前的制度安排来看审核评估，仍由教育部统筹并负责实施，评估方案没有提出底线要求，但其指导性和原则性仍然体现了审核评估的前瞻性和进步意识。也许在短时期内因其“软”而让人存疑，但就趋势而言，这恰恰是新秩序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审核评估在高等教育秩序重构中的作用视评估主体的差异而定。

（一）简化计划秩序

中国大学是行政权力主导、干预运作的产物，缺少自治空间。李泉鹰认为：应把适度的自发秩序和社会干预相结合，处理政府、市场和大学之间的关系，设计可行的高等教育制度，引领高等教育实践走出困境。赵宏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应从基于政府行政管制的旧秩序走向基于市场、依托政府和高校角色转换而构建的新秩序。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变革”提出了框架性原则。在反思前两轮教学评估对高等教育秩序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审核评估淡化了政府的直接干预，简化了计划秩序，更多地发挥监督和调控作用。审核评估作为一项教育制度，仍是“计划”的产物，但审核评估却可视为一种对“计划”进行调节和简化的制度。在国务院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的背景下，北京市启动高校取消编制管理试点工作，高校将有“财权”和“人权”。张绘认为：这是简政放权，

给予学校更多预算自主权的实质性举措。北京市的试点有待观察，但其风向标的意义不可否认，可视之为简化计划秩序的初步探索。

（二）培育自发秩序

在自发秩序中，以对他人的预期为基础，只要每个人坚持一般性规律，就都可以正确地估算他人的行为，从而保证和促进各自的利益。竞争之所以有合理性，是因为个体不能事先知道决定着竞争行为的那些事实，但所有的行为都由个体完成，价值只能通过个体在自由市场中的实际行为和选择得到体现。自发秩序的培育有两种途径，一种来源于自发秩序的增长或自我扩展，一种来自于政府的职责。哈耶克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些惯例一开始是出于某些原因或偶然的原因被采纳，而产生这些惯例的群体胜过了没有使用这些惯例的群体，这种效果特征使惯例得到延续。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惯例沉淀为人类心智，转化为调整人类思维和行动的规则，而这正是自发秩序的内在机理。这些“规则”是选择的结果，非设计的结果。因此，政府的职责在于提供游戏规则，继续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和低效率使优质高等教育产品匮乏，既不能保障国家利益，也不能保障个体利益，原因在于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设计”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虽然缺乏先天的自发秩序，但计划秩序下的高等教育在各种时空互动中，慢慢产生了一些自发秩序的因子审核评估将以提供专业服务的方式，培育并巩固自发秩序，引导高等教育特色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

（三）回归自然秩序

高等教育的组织形态——大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有其内在组织机理，以知识生产和交易为主轴，发展出“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自然秩序，遵循自然秩序的国外知名大学无不以其独特性区别于他人，成为国际市场中具有鲜明识别特征的优质产品。大学一旦获得身份标识，便具有了其不可逆转的内在属性，如果受到干扰，则会陷

入失序。如对我国财经教育的历史梳理发现，最早的财经学校的名称是“商务学堂”，培养的是“企业家”；1949年后学校改名为“财经院校”，培养“国家干部”，按照干部培训机构来运行，以行政代替教育。1978年以后，财经教育重新回到“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定位。在追赶、补偿和逐利心态的驱使下，财经教育遍地开花，不仅增加新的财经类院校，还在原有非财经类院校中广设财经类专业。时至今日，同质化的毕业生供过于求，财经教育的失序已然可见，财经教育的状况是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财经教育的经历折射的是大学自然秩序被破坏的后果。在高等教育自然秩序的重建中，审核评估将以自我完善和自我变革的方式发挥作用。自然秩序的建构者无疑由大学来承担，大学回归自然秩序，才可能专注于自己能生产的独特性知识，为市场提供可供选择的特定知识，从而达到去同质化的目的。回归自然秩序，高等学校才可能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办出特色。

五、结 语

作为制度设计，审核评估只呈现了高度抽象的原则性知识，将操作性知识留给了评估主体，赋予他们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需要通过他们的协同合作，重构高等教育新秩序。这便是审核评估的广阔前景和对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预示。审核评估考验评估主体的创造能力和反思能力以及对于教育本质的深刻洞见。加塞特认为：高校改革的实质是为了能够系统完整地体现其目标，对高校目标只作一些调整、修饰或变更最终会是一场空欢喜，除非高校自身已开始明确无误地、坚决果断地、名符其实地重新认识其使命。正如审核评估的价值预设和理念引领一样，最终必须转化为高校的实践行为，否则，所有的改革都将是一句空话。

作者：谢妮、朱凯琳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年第03期

“双一流”建设对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项目开始实施，标志着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双一流”建设与“211工程”“985工程”相比，其不同之一是将一流学科建设置于重要的地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重在一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重点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重在优势学科建设，促进特色发展。”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主要任务毫无疑问是建设一流学科，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需在建设一流学科的基础上建设一流高校。因此，三部委在《通知》中明确列出了465个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可以这样认为，“双一流”建设将学科建设在我国高校发展中的地位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势必对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政策推动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是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我国显现得尤为突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实施了以“院系调整”“专业设置”为核心内容的体制改革，改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的新型高等教育制度。这一制度的许多特征延续至今。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开启了近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决定》所指出的“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

权”，抓住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要害，使得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成为 30 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政府制定政策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不仅反映在高等教育体制这样的宏观领域，在高校内部治理等微观领域也深刻体现着。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内部治理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举措是大学章程的普遍制定。大学章程的制定虽然是各大学自己的事，但是政府制定的政策推动着大学章程制定工作的展开。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2011 年 11 月，教育部第 31 号令发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共 5 章 33 条对高等学校章程的地位、内容、制定程序、核准与监督等作了详细的规定。2014 年 5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核准与实施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工作规程》，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高校落实工作责任，抓紧开展，按时完成高校章程制定与核准任务，并明确规定“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985 工程’高校和‘211 工程’高校章程的核准工作；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高校章程的核准工作”。由上可以看出，正是在政府一系列规定、办法的指导下，所有高校完成了章程的制定工作，章程也开始在高校办学与内部治理中发挥作用。

同样，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推动。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历程，可以看到重点学科制度的建立对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5 年的《决定》指出：“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

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政府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在高校建设重点学科，以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1987 年，评选国家重点学科的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做好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关于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几点意见》等文件。1988 年经过申报与评审，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产生，共 416 个，其中文科 78 个、理科 86 个、工科 163 个、农科 36 个、医科 53 个，分布在 107 所高等学校。2001 年 3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通知》，启动第二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最终评选出 964 个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为了做好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作，先后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件。2006 年 12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国家重点学科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启动了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经过考核、申报、评选，共评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287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693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19 个。至此，三轮国家重点学科评选构筑了我国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制度，影响着高校学科建设的发展，其中重点学科建设制度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推动，这一基本特点则一目了然。

“双一流”建设在政府政策推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211 工程”“985 工程”以及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进一步延续。“双一流”建设项目确定的 465 个一流建设学科即是国家重点学科的“升级版”。政府政策推动成为我国高校学科发展的主要特点，这是由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行政化管理性质所决定的。毋庸讳言，政府的政策在近二三十年来的高校学科发展中的确发挥了不少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政府的政策不仅导引着高校学科发展工作的走向，而且与政策相伴随的经费投入为高校学科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因此，有

理由相信“双一流”建设的政策也将在我国高校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发挥应有的效应。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学科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高校是学科发展的主要承担者，高校教师是学科发展的根基所在。政府制定的有关学科发展的政策应该符合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诸如学科知识积累的长期性、学科发展的交叉、融通；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促使高校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政策依赖”的习惯；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将高校教师的注意力吸引到与学科发展相关的教学、科研中来，保障高校教师在学科发展中的学术自由。

二、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分层策略

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发展是现代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谓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多、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多等方面。以我国为例，据教育部2016年的统计，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596所，按照所承担的学历教育层次划分的话，其中培养研究生的本科高校576所，只有本科生教育的本科高校661所，专科层次的高校1359所。2016年的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2893.9万人，其中研究生198.1万人，本科生1612.9万人，专科生1082.9万人。按照学历教育层次划分，高等学校大致可分为上述3个层次；若要按照其他标准进行划分，高等学校的层次会更多一些。高等教育分层现象在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只是分层的机制有所不同。在美国，高等教育分层或许主要由“看不见的”市场去左右；在我国，高等教育分层则可能更多地由政府政策所决定。

分层现象存在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诸多方面，学科建设也不例外。有关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分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描述与认识。

第一，重点之分。如前所述，在近二三十年的高校学科建设中，重点学科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次国家重点学科的遴选，选出了一批国家重点学科，没有选上的就是非国家重点学

科。国家重点学科是少数，非国家重点学科是大多数。国家重点学科与非国家重点学科层次分明，两者的资源享有、政策支持有相当大的差别。不仅如此，在国家重点学科的示范效应下，有些省的教育行政部门设立了省重点学科，有些高校还设立了校重点学科，形成了由国家重点学科、省重点学科、校重点学科三个层次构成的重点学科体系。

第二，学位之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学位制度日臻完善，研究生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高等教育水平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是在政府的政策推动下，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审批制度。高校要想实施研究生教育，必须首先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同样，学科要想培养研究生，也必须先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如此，在高校的众多学科中，就有了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和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和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学士学位授予权学科5个层次。由于研究生教育与学科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岗位设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具有不同层级的学位授予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速度与水平。

第三，评估之分。近些年来评价及排名的迅速扩散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我国高校的学科发展也同样如此。虽然市面上有不少对高校学科的评价与排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学科评估。该学科评估基于各高校自愿参与评估学科所申报的材料和公开的数据，运用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依据评估指标体系，对参与评估的学科做出评估结果。该学科评估之所以影响大不仅在于评估机构的权威色彩，而且其评估结果已成为政府以及高校制定学科发展政策的主要依据。2016年开始、2017年结束的第四轮学科评估，

全国共有 7449 个学科参评，评估结果的公布与前三轮不同，采用位次百分位的方式，即“将排位前 70% 的学科分为 9 档公布：前 2%（或前 2 名）为 A+，2%~5% 为 A（不含 2%，下同），5%~10% 为 A—，10%~20% 为 B+，20%~30% 为 B，30%~40% 为 B—，40%~50% 为 C+，50%~60% 为 C，60%~70% 为 C—”。根据这一学科评估结果，各高校的学科实际上被分成了 10 个层级：A（三个层级）、B（三个层级）、C（三个层级），第 10 个层级为参与评估中的排位在 70% 以后的学科以及没有参加评估的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结果在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影响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如某省优势学科新一轮遴选条件规定，获得第四轮学科评估 B 等级以上的省属高校优势学科将自动进入下一轮。

高校中的学科分层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例如，哲学家康德在 1798 年出版的有关大学论说的著作《学院之争》中，分析了当时德国大学中的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在当时的德国大学，这 4 个学院内的主要学科或代表性学科分别为哲学、神学、法学、医学）的特征以及哲学院与其他 3 个学院的关系，指出这 4 个学院一般被人们分为上级学院与下级学院两个部分，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为上级学院，哲学院为下级学院。由于高校中的学科性质不同、发展历史不同、作用功能不同、人们的认识不同等，学科分层似乎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研究者认为：“学科等级源于不同主体的评价。从理论上讲，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评价主体，但与学科等级相涉的权力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理想状态下的、诉求‘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学者，也就是爱因斯坦所指的学术殿堂中的第一、二种人，他们主要关注学科的学术价值，倾向于按照学术水平对学科予以分级划等；一类是学术共同体外的相关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国家、大学和求学者群体，他们主要关注学科对国家、学校、个人发展的价值，热衷于按照社会功能水平对学科予以分级划等。”

在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中产生的分层现象，应该

说是基于学术共同体外的政府、大学对学科发展的政策要求与价值期待，而且政府、大学将分层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讲，“双一流”建设项目对于一流建设学科的认定延续并强化了高校学科分层发展、重点建设的基本思路。学科分层策略在规模巨大、学科众多的高等教育体系内，或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分层策略的实施确实使少部分学科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在 QS 的 2018 年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我国（大陆）有 17 所大学的 88 个学科进入排名前 50，与 2016 年（7 所）相比，大学数量增加了 143%。其中，北京大学 29 个，清华大学 21 个，上海交通大学 11 个，复旦大学 7 个，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各 3 个，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 2 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 1 个。不过也应该看到，学科分层策略尤其是校内学科分层策略的实施，人为地设置了学科间的差别，拉大了学科间的差距，效率优先的同时难以兼顾公平。在资源配置方面，易出现优势学科资源过度集中、弱势学科资源匮乏难以为继的问题。

三、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国际视野

“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学科建设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国家重点学科制度的延续，但区别与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名称上的变化如字面所示，过去是“国家重点学科”，现在是“世界一流学科”。由“国家”到“世界”充分反映出目标的升级、范围的扩大、标杆的提升，这种变化也体现出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国际视野的突出与拓展。

在国家重点学科时代，由重点学科带动的高校学科建设的目标主要是依据高校的实际状况，服务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诚如 2006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所指出的，“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学科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与调整，形成以国家重

点学科为骨干的学科体系，引领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全面提高，使之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进一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高层次人才和智力支撑”。当以国家重点学科为标杆的高校学科建设历经30年之后，学科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高校学科建设目标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2015年10月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中叶进入了“世界一流学科”时代。《方案》明确指出了“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与时间表，即“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国际视野的突出、加强与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潮流涌动，而且其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表现在科学知识、大学教师与学生在国家间的大量流动，而且随着国际评价与大学、学科排行榜的流行，大学办学的国际标准正在影响着各国大学的办学实践。《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QS、《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海软科等几大评价机构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对诸多国家的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的办学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大学、学科排行榜的实质是评价机构用一个尺度，或者说一个国际性的尺度（当然各评价机构的尺度有所不同）去评价不同国家的大学与学科。对我国高

校学科建设影响比较大的国际学科评价还有由美国科技信息所（ISI）推出的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学科排名。ESI分22个学科，依据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6项指标，对各国高校的学科进行统计评价，统计数字每两个月更新一次。能够进入ESI前1%或前1‰的学科标志着该学科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平。因此ESI学科排名成为“双一流”建设项目中一流建设学科认定的主要依据之一。

高校学科建设突出国际视野既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发展的需要，也符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代趋势。在“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导向下，高校的学科建设势必更加关注国际学科评价，国际学科排名将成为学科建设的标杆，进一步影响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举措。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学科建设的平衡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是国际与本土的平衡。如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既关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又保持自己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色与优势，这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学科建设亦如此。学科建设的目标不仅要参照国际评价的指标体系，更应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科所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有国际视野，更应扎根中国大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其次是学科间，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平衡。在国际学科评价中，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原因或许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国际学科评价本身就偏重自然科学，譬如ESI学科排名的22个学科中属于社会科学的只有经济与商业、社会科学总论两个学科；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国别色彩、本土性更强，人文社会科学所要解释的现象与问题更多的是面向本国、本土，很难用一个国际性的标准去评价不同国家的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在“世界一流学科”时代，高校学科建设的本土意识不应被忽视。

作者：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来源：《江苏高教》2018年07期

大学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基于组织文化和制度领导的视角——以北欧五所大学为例(上)

追求自由与民主，崇尚正义与法治，既是推动美国大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大学精神的价值表征与重要内涵。以此逻辑分析美国一流大学章程文本，既有助于深入把握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的共治理念、协商机制和包容精神，又可以为我国特色大学章程的建设和大学有效治理提供借鉴。

一、协商民主与大学治理结构：概念界定及其关联

二战以降，随着普选权的落实和大众民主的兴起，西方代议民主由于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的需要而遭受批评。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不足，以追求决策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为目标的协商民主得到复兴。作为一种复兴的民主治理形式，政治正义、合法性与公共利益是协商民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包容性、公开性与理性是协商民主达成的基本条件和有效保障，公共协商与集体决策是协商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核心概念，提升决策质量、促进合法决策与制约行政权的膨胀是协商民主的主要功能，培育公民协商美德与能力以及自我反思与自我怀疑精神是协商民主的外在价值，偏好的协调和转变以及共识的达成是协商民主追求的理想结果。虽然建立在自由宪政主义和批判理论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代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制度复杂性等现代性因素的制约。然而与传统民主模式相比，协商民主的功能更加完善，价值也更为多元，更具竞争力、合法性和正当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获

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如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了政治化的挤压，大学不能为现代经济提供合适的日益广泛的技能和资格并缺乏有效的职业训练而导致就业率不高，高等教育经费预算的紧缩，使大学自身的管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法治化进程中也变得日益复杂并遭受质疑。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反思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并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掀起了一场治理变革运动，其核心目标是改革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实现大学权力主体（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价值取向（从组织效率最大化到公共利益最大化）、运作逻辑（从依赖内部规则到借助协商等集体选择机制）等方面的变革。大学走向治理和善治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所谓大学治理，简单地说就是指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而大学治理结构，是指体现大学“非单一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旨在满足大学应对“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作为源起于公司治理理论的大学治理结构，它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协调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以使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商实现权利、义务和利益上的相互制衡，保障大学自治与社会参与、效率与公正的和谐统一。

概念的分析揭示出大学治理结构与协商民主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关联。两者之间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以合法性为价值追求（尤其是决策的合法性），以利益相关者为参与主体，以高度的公民参与为基本特征，以公共协商为运作逻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职能，以创造共识为主要目标。从相互关系角度来说，由于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治理模式，因此对大学治理结构而言，协商民主是其基本特征和重要内涵，是建构应对

“冲突和多元利益”需要的决策权结构的优选路径，有助于实现大学治理结构的帕累托最优。协商民主的功能在于它为大学利益相关者创设一种自由、平等、理性的协商氛围，使其有机会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偏好的同时能够理性对待他人的观点和偏好，遵循“更好观点的力量”实现偏好的协调和转变，寻求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决策，从而确保大学本质与功能最大限度释放，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一定意义上说，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途径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协商民主的功能，通过对话与协商处理大学公共事务，实现学术主体、行政主体、社会主体等重要战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正和博弈与良性互动。

二、美国一流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的协商民主机制

美国一流大学章程一般由法人构成、董事会、董事会委员会、大学官员、学术组织、学生事务和杂项六个部分组成，治理结构是大学章程阐述的重点。一般而言，董事会制度、校长负责制和学术评议会是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这三个要素彰显的多元参与机制、权力约束机制与组织平衡机制共同激起一种对于在民主政治中重新思考包容、平等、合理性与公共性的地位的兴趣，即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关注与研究。从这一角度来说，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的协商民主指的是，所有大学利益相关者基于理性和权利，通过对话、讨论、争论等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平等地参与大学治理，在超越自利和有局限性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偏好的协调和转变，形成对于全体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决策和共同的善。在这一层面，协商演化成为一种设计正义的重要规范，成为扩展和深化民主实践的主要理念。

（一）董事会制度与多元参与

美国大学章程规定，董事会为大学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具有决定性的制度权力。董事会一般要确定大学的发展任务与目标，并督促大学施政朝向既定目标有效地运作。植根于“分享治权”理念的董事会无疑是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最具特色的制度。综观美国大学章程董事会制度，其显著特征就是成员构成的多元化、成员遴选的民主化与决策的协商化。如耶鲁大学章程规定，耶鲁大学董事会由19名成员组成，其中3名当然成员，包括耶鲁大学校长、康涅狄格州州长和副州长，10名原董事的继承人，6名校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的选任上，也体现出利益相关方民主协商的特点。如加州大学章程规定，在遴选董事会成员时，州长应征询重大事务委员会的意见。成员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及集体决策彰显出董事会本身就是一种协商性机构，决策专断的可能性较小。

利益相关主体参与董事会决策不仅作为一种理念和规定体现在大学章程文本中，更在现实中得到落实。比如，国内学者在分析美国10所著名大学298名董事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后总结出两个特点，一是工商企业董事和律师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占58.7%），二是非学术界人士（占85%）与校外人士（占92.6%）居于主导地位。

非学术人员主导的大学董事会在美国一般称为外行董事会。外行管理的大学董事会是美国人的创造，并且至今仍是独特的美国制度。大学章程对董事会成员多元化的规定既是对相关法律法规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回音，也是对协商民主原则的遵循。成员的多元构成以及相互制衡意味着董事会的运行逻辑必定是妥协与协商式的，这也决定了大学董事会的功能主要在于协调各方价值判断和提供外部资源支持。在共治模式下，任何单一主体都没有控制董事会运作的绝对权力，合法的决策和行为必须建立在成员同意基础之上（董事会的决议一般

须得到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同意），而这种同意是超越个人主义和自利道德的自由、平等与理性协商的结果。协商民主作为协调与整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机制，能使董事会中的个体利益逐步趋向公共利益，最终达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融合与平衡。

（二）校长负责制与权力规制

董事会作为大学最高的治理及决策机构，拥有处理大学事务的普遍权力（主要有行政权、人事权、财务权和监管权等），肩负着推动大学发展、实现大学使命的责任。这些权责主要通过校长以及下设的各种委员会行使和承担。校长作为各种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在日常行政事务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落实董事会决定的学校最高行政负责人。这种体制通常被称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校长的选任上，美国大学章程一般规定校长由董事会或理事会选举产生。美国大学董事会不仅有权任命校长，也有权罢免校长。如果大学校长没有切实履行岗位职责，出现违法失职行为，将有可能被剥夺校长身份与权利。

从产生的机制与过程来看，虽然校长作为学校最高行政与教育的长官，对外代表学校，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但却不处在权力规约之中。校长的典型身份演变为一个发挥均衡作用的“牧羊人”，不仅要接受董事会的监督（包括董事会自身的监督和委托其他机构对校长进行牵制，如学术评议会），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向董事会负责，又要受到基层组织 and 大学成员对校长角色期待的约束，听取并接受他们有关学校发展和个人福利等方面的意见或建议，维护被代表的大学成员的利益（从大学成员作为董事会候选人这一角度也能给予解释）。如耶鲁大学章程规定，校长应向董事会提交来自全体教师和大学其他机构的建议，这些建议需要得到法人的批准。康奈尔大学章程规定，校长是董事会与各个

院系和学生团体之间公务交流的媒介。毫无疑问，董事会是校长权力的直接来源，校长除了董事会授予他的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力。甚至有学者认为，“校长几乎不能下达什么命令，也没有真正政治上的支持者，除了劝说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权力。校长可能只是校园里比较有道德影响力的人”。董事会授予校长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并且董事会一般不承担由自己行使决策权力而产生的责任。当学校陷入重大危机时，董事会通常采取的策略就是换校长。权力受到制衡的校长同时要对董事会和大学成员负责。作为董事会与各个委员会、院系和学生团体之间校务交流的媒介，校长发挥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桥梁纽带作用，接受多重监督，肩负多重责任。

综观之，校长负责制主要在两个层面体现出协商民主精神。第一，作为公共理性选择的结果，校长产生的程序与过程遵循了协商民主原则和要求，彰显了自由平等的大学利益相关者在选举校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凸显了他们参与理性协商的权利与能力。这种参与协商的能力又是民主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表现。第二，根据汉娜·阿伦特对权力的理解，权力属于某个群体并且只有在这个群体聚集在一起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其存在。这种观点意味着，权力在一致同意基础之上才能成立。按此逻辑，校长的权力是利益相关者赋予的，具有典型的契约性。校长没有超越所授权限之外的权力，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赞同是校长获得合法权力的根本途径。对校长而言，得到赞同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治校理念与行为同利益相关者的期待保持一致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赞同的前提和核心要素就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对所讨论问题表现出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核心价值观方面能够形成共识。而寻求共识是协商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这便要求，校长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须充分尊

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在作出决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权利与偏好，并以追求偏好的协调与转变为基本价值诉求，从而实现对权力的社会平衡。

（三）学术评议会与组织平衡

美国大学设立学术评议会的主要目的是彰显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追求最优决策的集体性产出，发挥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作用，使大学始终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核心机构。围绕学术事务进行协商议事而非行政决策是学术评议会的主要功能和特征。由于学术评议会蕴含着共同治理和民主协商的理念与特点，使得美国大学章程将其作为大学共同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如同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鼎立的权力部门。

人员构成的多元化，尤其是普通学术人员占有很大比例，构成了学术评议会的第一个协商民主特征。如学术评议会伯克利分会章程规定，伯克利分会成员包括校董会主席、校长、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人员。加州大学董事会章程规定，学术评议会成员包括校长与副校长、各校区校长与副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学科点主管、学籍注册官、图书馆馆员以及教学人员等。学术评议会的任何成员均有权就有关个人、系所或大学的任何事务要求在学术评议会相关委员会或多个委员会上进行听证。由此可见，学术评议会作为大学共同治理中的重要机构，保障了全校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多元化的人员构成排除了学术评议会作为教授及其他高级职称人员单独行使学术权力的弊端，赋予了普通学术人员与学生共享学术权力及参与大学治理与决策的资格，这种转变不仅是学术评议会自身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进步表现，也是大学走向治理和善治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与大学治理“超稳定性”结构的形成。

功能主要在于促进共同治理与保持组织平衡以及构成三权分立中的重要一极，成为学术评议会的第二个协商民主特征。行政委员会和学术评议会虽为董事会授权的下设机构，但是三者的权界较为清晰，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制衡，共同构成大学治理结构的主要权力运作图式。加州大学董事会章程中指出，学术评议会应该行使董事会所赋予的权力，履行董事会所规定的职责，学术评议会经董事会批准有权决定除荣誉学位外的入学、证书和学位事宜。可见，学术评议会是董事会下设的处理有关学术事务的一个管理机构，需要接受董事会的领导并向董事会负责。然而向董事会负责并不等于董事会可以无视学术评议会的权限对其横加干涉。相反，属于学术评议会范围内的事务决策，董事会必须征求其意见才能通过。如加州大学董事会章程规定，经校长提议，征询学术评议会意见后，董事会将设立各种学位，上述学位随后将由大学各学术单位授予合适的候选人。事实证明，以学术评议会为中心的共同治理机制成为美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手段，有助于实现教学研究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員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均衡，进而达成共识共同推动大学治理。在美国，学术评议会逐渐朝向一个制度合理、功能完善和运行规范的学术性管理机构发展，在大学共同治理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组织平衡角色。

大学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基于组织文化和制度领导的视角——以北欧五所大学为例（下）

三、原因分析

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协商民主机制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是大学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主动变革治理方式的一种结果，凸显出美国大学

深化治理结构改革的新路向，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大学治理结构变迁的趋势。

（一）协商民主传统渗透美国社会

国会、总统和法院三部门之间的协商，是美国分权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一事实有力地支持了协商民主是美国宪法的概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的思想萌芽。20世纪后期，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再次引起了美国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探索出了共识会议、协商式民意调查、愿景讨论会、公民陪审团、学习圈等协商民主形式。在学者的倡导下，美国对协商民主的认同和运用已经渗透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协商民主、社区民主协商等。面对势不可挡的协商民主潮流，美国一流大学不同程度地成为协商民主试验场所（有的大学成立了协商民主研究中心），对大学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有些协商民主理论家本身就是大学的教授与管理者，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推动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协商民主化进程。

（二）大学权力机构对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尊重

现代美国大学的主要特征是教师个人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以及由教师组成的学科院系具有强大的力量。成功的政治制度必须在大学这种权力分散的特性与建立集体决策机制的要求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协商民主则是保持这种平衡的有效手段。可以说，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表现出的协商民主精神和原则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可看作是协商民主理论在大学治理中的延伸与实践以及大学举办者对协商治理的有效回应，又可认为是大学为消除分歧和差异以及形成共识而有意采取的一种妥协策略。其中，在依法治教背景下，大学权力机构对利益相关者应有权利的尊重以及利益相关者对现实权利的争取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占主导地位。大学治理结构正是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以及行政权力与利益相关者权利之间的互动、博弈与融合中逐渐生成出协商民主基因。协商民主基因的产生反过来又有助于增强大学治理结构的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作为构建利益均衡机制的核心要素，协商民主能有效避免某些单一主体对大学的控制，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得大学获得校内外的广泛支持。

四、对完善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的启示

虽然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我国大学章程与美国大学章程制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但是在凸显“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借鉴“美国通见”，应是完善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的务实选择。

（一）实现行政决策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大学章程都是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合法律性特征明显。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每一所公办高校现行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现有文本中，几乎没有大学章程规定将师生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党委成员。这一方面既是我国大学领导体制的传统和特色，另一方面又为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预留了空间。与美国大学章程相比，我国大学章程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既没有规定党委会的人员职数和构成，也没有规定党委会的运行程序，大学权力运行缺乏“最低限度的公正”。为使利益相关者作为权力机构成员参与大学决策，提升决策质量和治理效果，体现协商共治的办学理念，有学者主张中国大学应引入美国董事会制度。事实上，国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确立了理事会的决策机构地位。然而，现实中更多的大学章程只是将董事会作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咨询建议机构看待，与美国大学董事会相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即使是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会依然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就完善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而言，需要思考的是如

何借鉴美国大学董事会多元主体治理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引入其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决定了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我国大学的立校之本、办学之基、力量之源。但是，强基固本不等于放弃局部开新。务实的选择是改善党委成员的结构与增加成员的人数，逐步实现行政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正如有学者提出，中国大学的党委会委员可以由三部分人组成，校外人士占三分之一、教授党员学生党员占三分之一，学校领导层的负责人占三分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要建立以党委会为主导的大学委员会。大学委员会成员由党委委员（占1/2-1/3）、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师生代表和合作办学代表组成。无论是哪一种改革方案，都凸显出目前的高校行政决策体制已不能适应高校利益格局中形成的不同利益主体并存、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局面，也不利于加快推进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大学章程应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使决策机构和权力向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师生代表、大学出资者与校外有关人士）开放，构建以党员代表为主体、成员构成比例相协调的决策体制机制，让多元利益主体在享受共同治理和民主协商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将是大学走向治理和善治的重要战略选择。

（二）构建权力制衡机制

构建权力制衡机制是避免权力腐败与维护权力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制衡的前提是权力的分离与彼此独立。在我国大学场域中，由于法律关系不明晰、权责不明确，致使权力制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失衡”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学校的微观管理过多以及校内学术权与监督权对行政权约束乏力两个方面。在政府与高校关系层面，由于法律没有明确高校公法人地位以及政府未能完全摆脱对学校进行微观管理的路径依赖，从而

影响到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局面的形成。在学校内部层面，虽然《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定了大学章程应当保障学术组织充分发挥咨询、审议、决策作用，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但是，行政权依然是控制学校运行和决策的主导力量，学术权与监督权发育不足，难以在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针对高校内外部权力失衡的现状，政府应改变传统微观管理的惯习，探索宏观管理的途径与方式，不断弱化政府的干预、控制等行政角色，强化政府的立法、监督等服务职能，明确政府和高校各自的权责，为高校真正实现依法自主办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高校应依凭大学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约束对高校拥有直接管理权的政府权力，充分发挥章程作为第三方约束机制的功能。对于高校内部权力，大学章程应完善校长选拔任用制度，借鉴美国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加强校内人员在校长选聘上的主导作用；同时，章程要归权于学术，逐步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校决策中的作用，使得学术权力能够自发地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从根本上说，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关键在于约束对高校拥有直接管理权的政府权力和高校中的行政权力，而制约行政权的膨胀又是协商民主的重要价值之一。在这里，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与协商民主实现了一种耦合。对约束政府权力来说，由于协商民主强调合法的决策来自于公民的公共协商，因此政府对高校管理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与高校进行理性协商的基础上，未经高校参与的政府教育决策是不符合协商民主原则的。对约束高校行政权力而言，协商民主强调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主张共识的达成是运用公共理性进行对话、讨论的结果，因而高校行政权力必须与学术权力进行平等的理性对话才能消除利益分化和冲突，进而达成共

识，形成教育合力。

作者：严玉萍 上海商学院教授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8年第04期

（三）凸显“妥协”在治理结构中的价值

美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中体现出的多元参与以及权力制衡原则既是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认同，也是对妥协理念的尊重和运用。综观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似乎难以寻觅到“妥协”影迹。这是因为妥协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了。人们往往过于强调妥协的消极意义，将它与“屈服”“背叛”“变节”等同。与美国相比，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妥协”，如学生不能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成员，教师不能选举和罢免校长，社会人士不能参与学校重大事务决策，学术委员会不能监督党委和校长等。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学章程治理结构，理性与务实的做法是既要坚守原则，又要适度妥协。事实上，妥协并不是对原则的牺牲，它是以非根本利益、非根本原则上的让步换取对根本利益、根本原则的坚持，是一种坚持原则稳步实现既定目标的最好方式。就现实而言，坚守原则主要包括：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双一流”建设目标不动摇，坚持高校基本职能不动摇。适度妥协主要指的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必要让步和改革，如赋予师生更多平等的参与权与决策权，加强学术委员会自身的建设，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学校进行评估与监督，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等等。需注意的是，不能将适度妥协与“怎么样都行”混同。从根本上说，适度妥协是对利益相关者基本权利和理性精神的尊重，是对教育民主理念的遵循，是对高校教育发展规律的顺应，而不是无原则、无立场、无底线的迎合献媚。显然，高校需要重新认识“妥协”在治理结构中的价值，区分值得称赞的妥协与可谴责的妥协，替教育“妥协”正名，为教育“妥协”而努力。



2006年—2016年全国普通本科招生数（历史学）

单位：（人）

